



2010年5月15日第8期

总第四十八期

2008年9月13日创刊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革研究

---

本期目录

蓦然回首

[黄晓龙 那年我差点杀人](#)

乱世民情

[戴为伟 宣叙调——妈妈](#)

文革起源研究

[杜钧福 高校录取中的阶级路线——文革根源浅析](#)

史林一叶

[朗 钧 跨国革命大批判——北京二中批判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

[杨大庆 “省无联”是怎样出台的——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二](#)

小资料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简讯

[余 樵 高龄老人的自印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编读往来

[孙传钊、郭建、蒋建、印红标、刘双、陈益南、戴为伟、胡泊、冯建军、任国庆](#)

来信及[编者](#)对郭建、[冯建军](#)的回复

---

【蓦然回首】

[那年我差点杀人](#)

[黄晓龙](#)

1971 年的四川省大竹县乌木渔场，经过了“清队”和“一打三反”中背靠背的检举和公开揭发。猜忌、提防像无处不在的病毒，弥漫在看似平和，却满是暧昧压抑的空气里；在每一道不经意的目光后面，似乎总有一双或者警觉惊悸、或者不怀好意的眼睛在打量、“关心”着你的一言一行。

尽管武斗的血腥和杀气已渐渐消散。但恐怖和惊悸却刻在了人们的记忆里，留在不时令人冷汗淋漓从夜半惊醒的噩梦中。

更令人警惧的现实是：据来自重庆、成都、北京等地的消息，一场新的名曰“清查 516 分子”的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那些曾经在清队、一打三反运动里已经遭到过清算的造反派头目，那些被称之为“幕后黑手”的大小干部，又再次面临着“比反革命还反革命”的严厉审查和清算。显然、这场运动不久就会在政治运动历来都要比大城市慢半拍的大竹展开。这不能不再次令已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尝尽惊恐的知青们再度紧张起来；不少人都在暗自忖度；这次该又轮到谁？自己能不能躲过噩运？而那些曾经尝到过“组织信任”的甜头，或得到升迁，或得到器重，或跃跃欲试准备加入积极分子行列的人们，也暗中兴奋起来。一个个睁大眼睛，竖起耳朵，伸长鼻子，警觉地观察、窥视着“新动向”，以获得向组织奉献忠心的素材，以提高自己在“革命队伍”中的地位。

### “渔场崽儿”面临重点整治

这个由 150 名文革前下乡的重庆“老知青”于 1963 年组建的渔场，在大竹最先竖起造反大旗，与社教工作团静坐对峙了十余个昼夜，使全县所有社教工作队不得不全面撤出。这些文革前曾经每月只有 15 至 17 元工资，却一直从事着捕鱼、挑土、抬石头、烧石灰之类高强度劳动的现代包身工们，随时会因为一句无意的感慨、牢骚，一次不经意的违纪越轨，就遭来训斥和大小会批判，重则被撤职减薪，直至被“内部管制”。在文革前夕到文革初期的四清运动里，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人人过关，背靠背的揭发构陷下历尽惊恐，自文革由“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迅速转变为“炮打司令部”以来；在长期压抑下不断积蓄起来的愤怒和宿怨，挣脱逆境的渴望，使他们的“革命”显得格外激进。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身上的枷锁，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换

成知青们稍稍悲观一点的判断则是：“叫花子打成了要饭的，还是叫花子。”

正是这种“也许会更好，绝不会更坏”的判断，和“革命不分先后”的鼓动，以及“自己解放自己”的诱惑，为他们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挥洒的空间。使他们在风起云涌的文革前期，成了大竹境内一个极具社会影响力的特殊群体。使渔场知青在大竹迅速成名，除了在县社教工作团办公室静坐对峙十多个昼夜的那次“革命行动”外，发生在1967中后期的几次事件，更具传奇色彩。

1967年5月，几个渔场知青在县城与当地造反派为某一小事发生冲突，最后在县城造反派数十人的“户口兵（讽刺渔场知青的造反不是为了革命而只是为了迁户口回城），滚出去！户口兵，滚出去”的起哄，嘲骂声里，狼狈不堪地被轰出了县城。当时正在渔场的知青们，一听说有同伙在县城被“臊皮”，甚至还没有搞清事情的原委，就一个个红了眼睛。几个头头登高一呼，马上就啸聚起三十多人，抄起大刀、钢钎，一路高呼着：“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从18里之外的渔场直扑县城。要向实力强大的工人兵团讨回尊严和面子。当几十个随时准备拼命的亡命徒刚刚接近北门车站，听见他们激荡着悲愤、绝望和杀气（其实也是为了壮胆）的口号，事先得知消息布防在北门一带，同样装备着大刀钢钎的工人兵团，突然全线崩溃，数千名被惊恐裹挟的武斗队员几乎在同一时刻转身就逃，上千根钢钎拖在地面的铿锵摩擦声和慌乱的脚步、惊呼声，像潮水般响彻整个县城的大小街道。随后，在县委球场上两军对峙中，面对这三十几个红了眼睛的亡命徒，由近百名复转军人组成的武斗精锐，一个个紧张得脸色铁青，其中竟有好几个人吓得双脚直抖，小便失禁。事后，在经部队调解，对峙双方解散后的县委球场上，至少有三四处散发着臊臭的尿迹。

不是骂我们是“户口兵”吗？老子就是想把户口办回重庆！受到头一天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鼓舞，知青们一不做二不休，第二天又结伙冲进渔场所在地的堡子区政府，用大刀钢钎逼着公安特派员开出几十张迁往重庆的户口迁移证，幸好这位特派员多长了心眼，谎称区里只能向县内迁移，必须到县公安局转签并盖章才能生效，当知青们欢天喜地丢掉手上的武器，一个个拿着“迁移证”兴冲冲赶到县公安局时，户政股早已人去楼空。这些自以为无所不能的知青们如梦初醒；比起不动声色，老谋深算，哪怕是最基层的机关干部，自己也不过是幼儿园的娃娃。

当年7月，也是这个渔场的知青的笔者，会同大竹中学刘业远、县农业局的

李果箐、余德合，县人委余训端，涂太印等机关干部和教师，发起组织了大竹反到底，并以反到底司令部的名义，在铅印的大竹反到底报上通栏印发了一篇《大竹向何处去》广为散发。自此、曾经是 815 派的工人兵团一统天下的大竹，公开分裂为两派。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争斗和“反军黑潮”（清理 516 工作组长定性语）。当我退出反到底后，另一个渔场知青唐士六又顶了上去，在反到底被赶出大竹后，他带领着一支以渔场知青为骨干的反到底武装，在西至广元、北迄通江、南江、巴中、平昌、东至垫江、梁平、万县一带东征西讨，成为川东北地区一支颇孚盛名的武斗精锐。直到 80 年代初，只要一提起《完蛋就完蛋》，提起唐士六，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大竹人，无不以各种夸张的语气和表情慨叹：“渔场崽儿！”

正是因在大竹文革中的影响，渔场知青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新生红色政权”为树立权威、恢复秩序，首当其冲予以重点整治的目标。

### 工作组长认定我是“516”

1971 年春节回重庆探亲期间，我就得知一场清查 516 的运动即将展开。早在 1967 年，我就从大字报上得知，北京出现了一个“516 兵团”，“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但一两个高校的公开红卫兵组织，何以突然间变成了庞大的、遍布全国的“阴谋集团”？一打三反刚刚过去，又冒出这样一个对象极为暧昧宽泛，随意性很强的清查运动，不能不令我升起阵阵不祥预感。

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脱”。1971 年 6 月底，由县委、县革委派出的清查 516 工作组进驻渔场。在第一次学习文件兼见面会上，工作组长逐个点名，要求点到的每一个人都站起来相互认识。当我站起来时，这个正在大竹城关派出所指导员任上的组长王秀廉大人，顿时收起笑容，推开眼镜，一双凝满杀气的三角眼，阴森森、冷飕飕地将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尽管当时已是 6 月底，闷热难当的会场内，几乎所有人都汗流浹背地摇着扇子，但我脊背上却顿时直冒冷气。原来轻松喧闹的会场刹哪间静得像死水。这时候退让露怯，肯定会让他认为你心头有鬼。在这个很多人都想找一块垫脚石向上爬的年头，你肯定就会成为他们想要的那一块。顿时、我迅速放松僵硬的面部肌肉，保持着礼貌的微笑，用冷冷的目光和他对待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等组长大人示意就自行从容坐下。

王秀廉仅仅惊愕尴尬地愣了片刻，又恢复了随意和微笑。只不过会不时向我

投来一瞥看似无意的阴冷目光。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内，除了在学习传达文件的大会上频繁地以阴森的目光对我施予特殊关照外，没有任何异常。但我清楚，这种相安无事的平静，不会太久。

果然，7月中旬一个晚上，工作组召集十几个积极分子开了一次会，第二天早上饭堂里就突然出现了一张标题为《黄晓龙，你慌什么？》的大字报。署名是与我同住一个寝室，外号叫“刘大罗兜”的新科积极分子。大字报称：自清查516的运动开展以来，我就一直惊恐不已、行为反常，肯定是心头有鬼云云。其它5、6张专门针对我的大字报，除了“反军”、“思想反动”之类的老调外，也没有拿出任何新“罪证”。但这毕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王秀濂要对我动手了。

也奇怪，一旦看清现实处境，多年的压抑、忐忑、惊恐顿时烟消云散。好斗叛逆的天性升腾起来。既然已被工作组看中，灾祸难免，任何伪装都失去了意义。既然两年多来委曲隐忍，在无时无刻都不敢放松的高度警觉中几近窒息，却仍然不能脱祸，那就挺直脊梁痛痛快快地迎接要来的一切吧！

王组长是个架着一副近视眼镜的中年警察。除了喜欢土财主式的附庸风雅外，据渔场众多观察家一致认为“此人好色”。无论在哪一个男知青面前，他都端着一副高深莫测，居高临下的架势。但一见到女知青，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他两眼立马就会绿虾虾地放光，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写满殷勤和馋涎欲滴的媚笑。粗厉的声音也变得粘糊甜腻起来，一口一个“你这个女孩子”的暧昧和亲热，更是叫人全身起鸡皮疙瘩。仅仅一个多星期，就有好事者在深夜捕鱼时，给了他一句通俗形象的形容：“口水把脚背都打穿了。”随后又简化为“口水”或“脚背”。一旦没有积极分子在场，深夜捕鱼打瞌睡时，就会有人捏着嗓子，用粘乎乎、甜腻腻的声音“你这个女孩子，好漂亮哟”，随即就有人齐声以“口水哟”、“脚背打穿啰”响应。于是在一阵阵轰然大笑中，瞌睡虫踪影全无。

王组长还经常在大小会上向我们宣讲他的理论独创：“你们抱怨工资低，其实不是国家没有钱，国家有的是钱，要多少有多少。为什么不多拿一点出来？就是怕党变修，国家变色，人民变懒。只有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有继续革命的意志。这个道理你们懂吗？嗯？”令我们这些多少还懂得点社会主义必须最大限度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懂得先进的生产关系必将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提高这类常识的知青们，只得你望我、我望你地苦笑。

凡学习文件或材料，王指导员绝对不让他人染指代读。每次开读前，茶杯、火柴、香烟都变成了“惊堂木”似的法器，凝聚着专政的威仪摆在固定位置。一顶半新不旧的警帽，被反复擦拭得雪亮的警徽朝着桌下的听众，端端正正安放在桌中央的前端。随着清理喉咙的几声咳嗽，那对在审问小偷和各种嫌疑犯中养成了凌厉煞气的三角眼四下一扫，一种阴森的寒气顿时升起。然后读文件。

每读完若干字句，他都要来上一段解释、发挥。偏偏那段时间的各类文件中，毛老头引用的文言和诗词极多。解释那些字义艰涩，出处生僻的文言文，就成了他卖弄学问，炫耀才华的难得机会。每到此时、他总是两眼放光（多数时间都朝着女知青，尤其是那几个稍有点姿色的，其目光的关注频度最高），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地“抛文”。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随意离席上厕所，甚至不能丝毫走神，必须像无知的小学生一样，恭恭敬敬聆听他的教诲。哪怕是信口雌黄，张飞杀岳飞，你也绝对不能流露出丝毫嘲笑、轻蔑，或者疑惑和不以为然。

大约是 8 月下旬一次学习文件；当他结结巴巴地读完一段涉及古典的文字后。又眉飞色舞地开始卖弄发挥，从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扯到“庆父不死，蜀（鲁）乱不已”，从刘结挺、张西挺扯到刘文辉，刘湘，又扯到张国焘。我强忍着不笑出来，正准备起身上厕所时，突听王组长炸雷似的一声断喝：“黄晓龙，黄部长，黄司令，你笑啥子？这是什么时候？你以为你还是司令、部长？你的问题还早得很！现在我就告诉你，做好准备；好好交待你的反军言行，你的问题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听到这一连串威胁，我全身的血顿时涌上头顶，我忍不住也毫不客气地回应：“王组长，我听到最高指示，听到毛主席的教导，应该高兴、应该感到幸福吧？我不该笑吗？”这令他顿时语塞。脸色顿时胀得紫红，在尴尬的沉默中愣了不到一秒，王组长桌子一拍就站起来，嘴角、两腮、和手指头都打着颤，指着我吼道：“黄晓龙，我告诉你，你就是 516 分子，大竹的反军黑潮就是你掀起的！你就是罪魁祸首！工作组想放过你，革命群众也不答应！”

尽管早料到迟早会出现这种局面，但毕竟来得太早，太突然，令我在愕然中顿时意识空白，无言以对。

见我没有任何回应，这位惯于颐指气使的指导员，又放缓语气开导我：“黄晓龙、你连龟儿、老子之类的粗话都说不通畅，你是不是太知识分子了？太引人注意了？像你这种封资修文化中毒很深，又当过反到底司令、部长，写过反军文章的

人，不是 516 才怪了。”听他这么一说，我顿时意识到他绝对没有掌握任何过硬的“钢鞭”材料（事实上，我仅仅在大竹反到底担任了不到两个月的二号勤务员，又何来“钢鞭”？），我马上就理直气壮地反诘：“王组长，你说我是 516，起码要有证据吧？516 在大竹有哪些活动？在大竹由哪些人组成？你说得清楚吗？你说我是 516，那好！我是何时加入的？履行了哪些手续？我的上下级有哪些？进行了哪些活动？我连 516 是怎么回事都不清楚，更没有履行过任何手续，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我在大竹反到底前后不到两个月，哪来……”

不等我说完，王组长又迅速恢复了他那种惯有的，阴阳怪气的微笑和自信，打断我：“好了、好了，黄晓龙、不要以为你会说，就把你没办法；我告诉你，即使找不到证据，没有履行手续，组织上照样可以认定你是 516。你不是知识分子吗？这点常识都不懂？”说完了，又奚落道：“建议你好好领会一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最高指示，不要以为只有自己最聪明！”

原来神秘莫测的“516”竟是这么回事；什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什么“极左纲领”，全是扯淡！全是莫须有！什么组织认定？组织是谁？组织就是大权在握者。就是执掌着你生死祸福的那几个人或一个人。只要执掌大权者上下嘴皮一动，你就被“认定”了。而且还是以神圣的“组织”的名义！

### 决心以死相拼

一天晚上，自知大劫在即，再也无心摆弄手风琴，我独自躺在人迹罕至的大坝左则的草地上，仰望着宇宙深处发出的星光，回忆着短暂多舛的一生。

历经了太多的磨难和惊恐，尽管心上早已磨出了一层硬茧。但此刻无论怎样努力还是驱不走满腹悲凉感慨。挨整已成定局，多愁善感、愤愤不平何用？反复分析权衡，苦苦思考找寻出路，依然是一团乱麻一派茫然。无奈之下我痛下决心；你王秀廉无视事实硬要将我置之死地；那好！我们就来个以死相拼！这个充满了势利、叛卖、奸诈和丑恶的冷冰冰的世界，已经不值得留恋。死，既是解脱、复仇，也是为民除害。我顿时感到一种多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无所顾忌。甚至突然想起了《两地书》中，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一段话，大意是；如果遇到老虎要吃我，我就爬上大树，老虎在树下守多久、我就在树上坐多久，绝不下来。即使即将饿死，我也要先用皮带把自己牢牢捆在树上，就是死了，也绝不让自己掉下去，

让老虎遂愿。在那次对“是生存，还是死亡”做出最后的抉择时；鲁迅对邪恶绝不妥协、退让，绝不给敌人任何机会的决绝和彻底，就成了我的座右铭。

正当此时；突听得溢洪道那边传来石××“义正辞严”的诘问：“你敢保证他思想不反动？保证他没有敌我性质的问题？”随即是张华益理直气壮的回答：“我虽然不敢保证他没有大问题，但先入为主地把他定成敌我矛盾，再去收集证据，就是成心整人。毛主席说要重证据，不要逼供信。这样做绝不是党的政策！”“那你敢说 he 一点问题也没有？他心里怎么想的你也清楚？”“毛主席说‘存在决定意识’，他如果仇视党和社会主义，工作劳动就不会一直那样积极，更不敢经常给领导提意见。”“那他那些反军文章又说明什么？”“你没有参与过打砸抢？你没有偷过鱼？你没有打过犯错误的当权派？你不晓得‘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高指示？”沉默有顷后又是张华益的声音；“王组长说过，只要站出来揭发黄晓龙，他就介绍我入党。我当然想入党。但我实在想不起，除了反到底那些事，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在哪里。这不是安心整人吗？”

听到这里，自认所有的温情早已干枯的我，顿时眼眶里涨满了热泪。我为自己用自私、冷漠去揣摩所有的人感到无地自容。我再没有勇气听下去了。提起雨衣，逃也似地回到宿舍。

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并不是所有人的正义和良知都在诱惑和威逼下完全沦丧！所谓“头顶三尺有神灵”、“是非自在人心”，至理名言也！

还有一个人不在经意中的几句宽慰，也同样令我至今难忘；他是不久前调进渔场担任副场长的前志愿军特等功臣彭业臣。这个连自己的姓名都写得歪歪扭扭，为人却非常耿直的转业军人，与另一个转业来的渔场毛副主任是迥然相异的两类人（否则、照他的功绩、资历早就是师、团级以上）。也是我被王秀廉“认定”为“516”后的一个下午，工作组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一个什么“重要”文件（王秀廉到来后，文件传达开始严格按若干等级，先党内后干部，再积极分子，最后才是一般知青）。见队长和积极分子都去了不用晒太阳的会场，几乎所有知青都阴一个阳一个地梭回了宿舍。只有我一个人还在鱼池工地上，满头大汗地用片石砌着产卵池护坡。我之所以如此，仅仅为了用肌体的疲劳淡化深广无涯的绝望而已。

就在我抱着一块近百斤重的大石头填进基坑时，身后响起了一个有些沙哑的

声音：“老黄，来抽支烟，歇一下。”只见老彭从小半包《大前门》里掏出一支烟，笑吟吟的递过来。当时的渔场知青，每两三天能有一包《向阳花》已属不易，《巨浪》、《飞雁》仅仅是发工资时偶尔来一包的奢侈，春节能抽上《大前门》更属幸运稀罕。所以，我颇有些不好意思地连连推辞。见我如此，他的脸一下就“马”起来，“你们知识分子就是这些假，明明想要又不好意思，拿着！”看着我点燃烟深深吸了一口，有点陶醉的样子，他干脆又将剩下的半包烟塞给我，然后轻轻拍着我的肩头道，“我晓得你这几天难过，你要相信是红说不黑，是黑说不红，放开一点，不要怕，嗯？”说完就背着手慢慢离去。

这在平日里再普通不过的几句宽慰，那时却令我升起一阵自责反省；自到渔场以来，自恃多读了几本书，对文化较低的知青，始终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认为他们无知、粗俗、目光短浅、物质层面的追求远远多于精神，而现在却恰恰是我一直不屑为伍的文化低的人，在暗中给了我同情。

还有那个和我基本没有什么交往的黄美胜，一次在宿舍走廊和我对面擦过时，突然叫住我，“黄晓龙，莫要成天做出苦大仇深的样子，活一天就要高兴一天。你晓得 62 年美国准备打古巴时，卡斯特罗说过那句话吗？他说：凭美国的实力完全能够占领古巴，但在被占领的古巴土地上，绝对见不到一个活人，一栋完整的建筑。怕啥子？人活着就是有那股志气。”尽管我努力抑制着自己，除了微微点点头外，尽力让脸上做到波澜不兴。但心头涌起的巨澜却铺天盖地。我只能站在寝室门边，用满怀感激的目光送他走进位于走廊最前端的宿舍。

当然、这些没有权力的人都左右不了我的最后命运，但起码让我看到，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人世间照样有温暖，有良知。

我非常清楚；只要王秀廉还是工作组长，除非出现奇迹，我被打成 516 的厄运是不会改变的。以死相拼就必不可免。在正式宣布我为 516 分子之前，将是我最后的人生时光。我得尽可能地弥补一下此生的众多遗憾。于是、我向远在冷湖油田的二姐去了一封信，谎称出差掉了一笔公款必须赔偿。大约 9 月初就收到她汇来的 50 元。这在当时的渔场可是一笔巨款。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书、电影可以解除灵魂的压抑和饥渴，可以令我看到一点希望。在大竹、除了能和相识不久、已在当地就业的知青挚友杨思聪吹吹牛、发发牢骚，交流各自经历的幸福、快乐、痛苦和人生经验，畅谈对时局、对某些艺术作品的感受看法，相互鼓励，

以略微填补一下精神黑洞外。吃肉解馋，品尝糖的美味就成了物质享受的最高境界。从我 1959 年考入水产校就进入了“灾荒年”，随后，除了在 1965 年双抢前后大竹猪肉敞开供应过一段时间外（但那时每月 15——17 元的工资只够伙食费，敞开供应对我们只是画饼），吃肉历来是一年四季都在淋漓大汗中付出巨大体力能量的我们，从心理到生理的渴望。接到这笔巨款后，每逢休息甚至只要有能够从渔场步行 18 里到达县城然后回来的足够时间，我都要进城炒上一份肉，再来一碗肉片汤大快朵颐。然后再找熟人开后门，称上半斤牛肉干，或者花生糖，再不济也要称上半斤水果糖，以待在渔场享用。

每有传达学习文件材料的全场大会，王秀廉始终没有忘记用那双冷飏飏阴森森的三角眼对我频繁关照，那目光有一种猫捉老鼠式的得意和戏谑，更有一种陶醉于手执生杀予夺权柄的满足和炫耀。尽管我已决心在最后时刻和他同归于尽，但每当见到他那种癞狗长毛式的得意，总是忍不住怒火中烧，尤其是当他半通不通、漏洞百出地卖弄炫耀学识时，好斗的本能，总令我涌起要给这个小人一顿奚落嘲弄的冲动。我知道，正如骂女人为丑八怪一样，奚落嘲笑他的附庸风雅和无知，是他的最痛，也是对他最痛快的报复。但为了那一天不致来得太早，为了让他不致生出警觉，我只得隐忍着，低下头尽量不看、不听，尽量让自己平和下来。

### 也许是最后一次回家

在一边急不可耐的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一边又下意识地希望这种剑拔弩张的僵持无限期延长下去的忐忑中，国庆到了。9 月 29 号下午，渔场领导宣布，当晚捕鱼任务完成后即开始放假三天，10 月 2 号晚上 8 点前必须全部返场。晚饭前，正当我和其它十几个准备回家的知青在办公室围着王会计开探亲证明时，王秀廉抱着茶杯缓缓走到王会计背后，用那双阴森森的眼睛冷冷地盯着我。当轮到这时，王会计仅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在事先打印好了的介绍信上刷刷几笔填上了我的姓名字、日期，盖好公章，头也不抬就递给我。此时、王秀廉终于忍不住了：“黄晓龙，这个时候了，你还要回重庆？”我顿时来了兴致，微笑着回敬：“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不是国庆节吗？”

“我建议你不要回去，好好想想自己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用不着想。”

也许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冷硬，他稍稍愣了一下，我又趁热打铁：“我至少现在还是革命群众吧？上面还没有下达我黄晓龙是 516 分子的批文吧？我为什么不可以回去？你暂时还没有不准我回家的权力吧？”

见我如此强硬，王秀廉马上变了脸；“黄晓龙，我是暂时管不了你，不过我警告你要按时回场，否则你就是罪上加罪！”

“我有什么罪？！不就是你个人的欲加之罪吗？”说完我就转身准备大步离去，他突然厉声叫道：“黄晓龙，回来！”我冷冷地转过身去，见全办公室的十几个人都在以各种眼神看着他，他才勉强忍住怒气道：“记住，三号晚上 6 点点名。”

“对不起，熊书记说的是 8 点。”我说完，微笑着向他点点头，大步离去。

当晚捕鱼时，想起下午的一幕，我又生出几分后悔，俗话说宁可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挑战他的淫威，踩他的痛脚，肯定将加剧敌意。那最后时刻会不会来得更早？如果他生出警觉，采取了预防措施，使最后和他同归于尽的决心不能如愿，岂不是小不忍乱了大谋？但事已至此、唯有听天由命。

当晚捕鱼回来，轮到我提起每人两条的定量鱼过秤时；掌称的王老婆婆、王素芳，突然一改常态、大发善心：“黄晓龙你家里那么多兄弟姐妹，这两条鱼哪里够，去、还去选两条来，我那两条鱼让给你。”当我喜出望外地提着四条鱼，在电站机房破腹打甲时才突然悟到，我和王秀廉下午那场较量肯定已在全场传开了，不然锱铢必较的王老婆婆，不会慷慨地将供应指标让给我。这当然是同情和善意的表达，但也表明最后的时刻已经不会太远了。

意识到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踏上故土，最后一次与亲人团聚，和挚友交流。我抑住满腹的不舍和悲凉，没有在母亲和兄妹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情绪。当时，聂云岚（注：原重庆出版社编辑，被打成右派后在长寿湖渔场劳动改造）老师也从长寿湖回家探亲，除了脸色凝重地在室内走来走去，听着我的倾诉外，只得用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的“也许事情不至于那么严重吧”来宽慰我。道别时，一向最多将我送到宿舍大门就回头的他，竟默默地陪我走到储奇门十字路口才和我分手。

在那些年、每逢节假日，辉夏的家，历来都是同学朋友聚会交流的沙龙。在业余文艺圈子内稍有点名气的绘画爱好者、文学爱好者是那里的常客，也是获取各种信息乃至各种思潮交流碰撞的地方。在即将离别的 10 月 2 号晚上，我再也忍不住，将自己在渔场的现实境况，和王秀廉的几次冲突，都向朋友们和盘托出。

当时身为市内某大商场革委会委员，清理 516 领导小组成员的岳燮容，认为就我在文革中仅仅当过两个月头头的情况，就“认定”我是 516 分子简直是天方夜谭，叫我根本不用怕，上面肯定不会批。正在钻研绘画的张琪居则认为，在“山高皇帝远”的专县，开罪了手执生杀大权的当权者，什么不可思议的荒谬都可能成立。他说：“现在黄晓龙的处境，是我们这些人当中，最危险艰难的，我建议不要再扯别的话题了，大家都集中精力给他想想对策。”然而，在我们这一堆既无从政经验，更不懂翻云覆雨手段的文艺青年当中，又有谁能够拿得出具体可行的建议？除了同情和担忧、宽慰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分手时，张琪居紧紧握住我的手，模仿着一口倒像不像的“浙江官话”道：“牺牲未到最后时刻绝不轻言牺牲！”顿时就令泪腺早已枯竭的我，眼里涨满了暖暖的酸涩。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里，孤悬在远离现代文明的“夹皮沟”，唯有亲历者才可能体味到那种没有沾染任何功利色彩的友谊的珍贵和温暖。一句不经意的话，往往会令你灵魂为之震颤，令你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豁然开朗，足以使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感到孤独无助。可惜的是；这些年来，这些美好的情感已和我们越来越远，似乎唯有在回忆里才能找到。

### 最后时刻逼近

也许是命中注定，那年的 10 月 3 日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天刚亮，我就赶到了江北红旗河沟，在公路边从黎明等到中午，竟连一个熟人的车也没碰到（那时重庆到大竹的车费是 5.4 元，对每月只有 22 元工资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奢侈，所以搭车是我们往来于重庆大竹之间的普遍选择）。焦急不安中，直到中午 1 点前后，才碰到 46 队一个叫钱乐平的安徽籍年轻司机刚刚卸完货准备装盐巴回大竹。喜出望外的我上车后才知道，他此次要绕道广安、渠县再回大竹。那时的客运班车都是早上发车，改乘客车显然为时已晚。也许是命中注定，当天车还没到渠县就已经是晚上 11 点了，不得不在离渠县还有十多公里的一个小镇旅馆住下。第二天凌晨 5 点又开车出发，哪知过渠县不久，汽车的离合器又踩不开了，在我的一再恳求下，钱乐平凭借着艺高胆大，居然硬是次次都准确判断出发动机转速和行车速度间的契合点，及时换档，竟奇迹般地从渠县爬上了九盘寺，又顺利抵达大竹城。途中居然没有出事、没有抛锚，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奇迹。

一路狂奔，气喘吁吁地赶到渔场时已经是 10 点半了，王秀廉正在主持一个文件学习会。好像专门在等我似的，刚刚走进会场他连头都没抬，就将我叫住，“黄晓龙现在是多少时间了，你知道这个时候才回渔场是什么性质吗？我告诉你，这是对抗运动！”“据我理解，这仅仅是一次迫不得已的违纪，因为汽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不要说了！”王秀廉一声断喝，音频顿时提高了八度：“黄晓龙，你气焰不要太嚣张，我告诉你，你的材料早就报上去了，一批下来你就是 516 分子！”见我盯着他没有开腔，又道：“黄晓龙你晓得 516 的性质吗？那比反革命还反革命！”

那种得意加戏谑，一下将本来想尽量拖延最后时刻到来的我逼到了墙角，血顿时冲上了头顶，我也顾不上多想，立即回应：“还没有批下来吧？没有批下来我就不是 516 分子，说我就是 516 也好，认定也好，那都是你的个人看法，不能代表组织，我拒不接受！”

“那好！你就等着，我看要不了多久，就在这几天！”

我心头顿时一横；这个时候了还要反复折磨我，那好、老子不仅要在死前先拉你垫背。从现在起，老子每一刻都不会让你舒服自在！原本准备躲到不引人注目的角落，此刻干脆将竹椅放在正对着他的显眼位置，装作听文件，把所有的仇恨鄙夷都集中在眼里直盯着他，开始王秀廉读得还算顺畅，但几分钟后就稳不住了，始而汗水初露、继之结结巴巴，后来原本青色的脸渐渐胀成了猪肝色，在频频的慌乱走神中，语无伦次起来，最后又爆发出一阵连连大咳。不得不破天荒地将文件交给张华益代读（这可是他来渔场后的首例），而他自己则点上一支烟，起身转到会场外去了。而此时的我、从紧张中松弛下来，手脚都在阵阵微微发颤。

趁下午上班的休息间隙无人注意，我偷偷从加工房找来一段 7、8 公分长的钢锯片，躲在电站机房用砂轮将两面和尖端都磨得锋快，再缠上布条，插在早就悄悄缝制在内裤贴身面的小口袋内；皮带也扔掉，用一段多股塑料软电线代替，只需一拉就可以扯下来既当导线又可当勒颈索。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到了最后那一刻，绝不能轻易罢手。无论是用刀割颈，用线勒喉，用电击，都必须对准要害下狠手，首击毙命，然后再痛痛快快地自行了断，绝不犹豫迟疑。

第二天，托伙食团采购从大竹买来一斤牛肉干，在工间休息独处时，在辗转难眠的静夜，在品尝着难得美味的满足中，忘掉当前的危局，忘掉也许是几小时、

几十小时、乃至几天后，就是我拉着王秀廉血溅五步，共赴黄泉的最后时刻。

此时、十几年来孜孜以求的诗人梦想早已破灭。保尔·柯察金式的人生理想和追求，毫无疑问正是诱使我多次“犯错误”的“祸根”，不！什么理想、什么人生追求，在这种世道下，本来就是美丽的陷阱和咒语。对现实、对个人的命运，我已不存丝毫希望。在 1967 年前后那个全民造反的狂欢时代，一度大力宣传公仆由人民选举，随时可以罢免的巴黎公社原则，结果全是骗人的谎言。在这个告密、叛卖、诬陷和献媚不断获得鼓励奖赏的黑暗时代；生而何欢，死又何憾！活着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没有追求幸福和理想的自由，没有捍卫尊严的权利，仅仅是鹦鹉学舌般的驯服工具、螺丝钉，与行尸走肉何异？与奴隶何异？痛痛快快的死实在是幸运、是解脱。何况，还将有一个专事整人的恶徒垫背！

但我还年轻，我才 28 岁，生活才开始不久；我还没有品尝过爱情的幸福、甜蜜，没有过任何异性间的感情交流，甚至没有碰过、拉过一次异性的手。

我有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幼年时、父亲就以“特嫌”罪名冤死狱中。倔强的母亲在姑婆，外婆的鼎力相助下，以微薄的薪金支撑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家。1954 年底母亲再婚后，不到三年，继父又被打成右派，半年后又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是母亲以她特有的，几近极端的教育方式，将全家兄妹都养成了独立自主倔犟进取的性格。我的同父异母的大姐，早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地下党，自姐夫被打成右派后，一直忍辱负重如履薄冰般地勤奋工作、养育孩子，同样因为轻信了谎言宣传，才满腔热情地投身文革，这场清查运动，把她也打成重庆的 516——“三老会”的重要成员，被冠以“上窜下跳的联络员”，反复出现在每一份揭批“三老会”的材料里。这几个月，她可能已经在数不清的批斗会和学习班里受尽屈辱折磨。我的一直穿着补疤衣服读完五年大学的二姐，一毕业就分配到青海冷湖油田，在那里，从上百米地下抽取的的饮水，都苦涩得难以下咽。冬季外出一旦遇上暴风雪，迷路或汽车抛锚就必死无疑。就是因为有她每月给家里的接济，这个家才从 1965 年之前接近崩溃的极端贫困中挣扎出来。她却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但为了每月十几元的高寒补贴以支撑这个家，却一直在“满山乱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前流放地上苦苦坚持。最令我不舍、不忍的是 1962 年差点被“疤骨流疽”（骨结核的俗称）夺去性命的二弟，1964 年本来已经在江北一小学当代课教师，一次在江北区的阶级教育展览上，看到有“大特务黄远昌”

(父亲)的文字,吓得他再也不敢去学校。恰好当时云南省建筑公司在重庆招工,报名去昆明当了建筑工人。1967年、我退出反到底后,被一伙人追杀,是他逼着我远赴昆明。以每月30几元的工资,苦苦维持着我和幺兄弟三个人的生计。这些年、他每次回重庆探亲,都要专门到大竹来渔场看我。三弟是父亲的遗腹子,此时正在涪陵天台公社当知青,令我深深愧疚的是;因为看不起他的自私胆小,我从来就没有给过他好脸色。最令我揪心的是我苦命的妹妹,初中刚毕业年仅15岁就偷偷自己下掉户口,到离达县还有一百多里的山区林场当了知青。1965年我专程去林场看过她,长期缺乏油水滋润的伙食团大铁锅长满铁锈,连煮出的饭都泛着铁红色。1970年,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妹夫调回重庆,留下妹妹和年仅1岁的侄女无望地留在农村,前不久她来信中有一句话,令我一想起就心头滴血:“我们都是唐家沱的死尸——流不出去了。”(注:唐家沱是流经重庆老城区的长江下游一处回水沱,重庆城溺水身亡者尸体通常会在那里滞留)我的乖巧机灵的幺兄弟,因为家庭出身,成绩再好也只能读街道民中,再过一年他就该毕业了,等待他的只有华山一条路——下乡当知青。我知道;一旦我对王秀廉施行“阶级报复”,并“畏罪自杀”。对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对我的亲人们,无异是雪上加霜,屋漏逢雨。但我已经别无选择。我没有在缺乏起码尊严的境遇下苟活的勇气,更不愿窝窝囊囊地独自“自绝于人民”。无端置我于死地的恶人,必须先死。

### 好友急告惊人消息

绝处逢生的转机是在10月6号出现的。

当天下午上班不久,李伯寿笑嘻嘻跑来告诉我,说306民工团有一个叫王甘让的重庆知青,托他带口信,叫我晚饭后一定要去一趟,有重要的事情要同我商量。李伯寿是繁殖队少有的几个血统工人后代,也是在我被“组织认定”为516分子后,仅有的几个还敢和我正常来往说笑的知青之一。

我匆匆吃完晚饭,划着双飞燕转过梨子坳,急急向306赶去,船还没拢岸,就看见王甘让满脸微笑等在湖边。

王甘让是1964年到大竹落户的老知青。早在1965年的省群众文艺汇演期间,他就以其音域宽阔,干净明亮、极具穿透力的男高音,被省歌剧院看中,并在省歌剧院逗留了整整两个月,最后因为家庭出身“黑”(所谓“历史反革命”),政

审通不过，才又回到欧家林场，重新当起了知青。前些年我认识他时，他已结了婚，虽然个子小，却是头等劳力，拿的是最高工分。1970年开始在知青中招工，他的根红苗正的妻子就被招进了县国营旅馆，不久就被当成接班人培养。领导在多次谈话中，暗示她要同出身不好的丈夫划清界限。当妻子在一次夫妻间的闲谈中偶尔提起时，甘让即主动提出了离婚。他只为不影响前妻的前途。但我非常清楚；所谓“划清界限”，对极富自尊的甘让无论如何都是难于承受的羞辱和折磨。

见到我上岸，王甘让似乎松了一口气，第一句话就是：“你终于来了。”

原来，早在8月底，他从湘渝铁路民兵师宣传队回大竹办事时，就得知我已经被工作组“认定”为516分子，就一直隐隐为我担心。国庆当天晚上，即将解散的湘渝铁路民兵师宣传队在地委礼堂作最后的汇报演出，当开幕式按彩排的程序开始齐声高呼“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时，被突然冲上台的铁道师政委厉声喝止。这位政委站到麦克风前向全场宣布：

“从现在起，除了对毛主席外，对任何人都不准再搞敬祝之类的个人崇拜了。这是个是否忠于毛主席的大是大非界限，是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

演出开始后，原来早已定下来的节目。凡是和林彪有关的都被一律取消。于是，有关林彪已经出事的猜测，在演出结束后就不胫而走。第二天，在一步一岗，五步一哨的森严戒备下，地委大礼堂召开由党政军各界领导干部参加的中央文件传达大会。据王甘让和同是重庆知青的新婚妻子李玲，从散会出来后的军人间的交谈中听到的只言片语中，更是肯定了这一猜测。

10月4号，民兵师宣传队解散前的最后一天，原来军分区内被隔离审查的几个516分子，突然解除了隔离。这显然表明，这场莫名其妙的清查运动已经夭折。从而让甘让夫妇暗自为我松了一口气。昨天晚上，夫妇俩在306报到后，本来商量好准备于今天下午，由甘让步行到渔场向我通报这一消息。但无意间于中午在供销社食堂遇见了认识的李伯寿。李伯寿自告奋勇给我带口信。

那一晚，我们兴奋地抽着烟，从中国政局的剧变，未来政策局势的趋向和各种可能，我们各自的出路前途，对生活、对人生的理解，尤其是他们在地委传达大会后听到的若干关键词后面潜藏着的各种可能的真相、含义，进行了热烈的猜测和争论。我们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苦日子终于熬到了头的兴奋和期盼。

## 最后的较量

回到渔场，反复咀嚼着这一重大事变的含义，我甚至想象着王秀廉传达有关林彪问题的文件时，可能出现的各种表情。

对王秀廉们的厌恶和不齿，既来自艰辛坎坷的人生经历，更来自思考和觉悟；这一类惯于用他人的血，他人的不幸铺筑自己升迁之路的恶人，本来就是几千年专制“恶政”培育出来的恶花毒果，也是历代恶政得以复制延续的社会“培养基”。在不算太短的人生阅历里，每到关键时刻，我曾经数次领教过这类人的无耻。1957年暑期，在16中任教的继父被打成右派。时为16中初二年级学生的我，在9月开学的第一堂美术课上，一向和蔼可亲的美术老师，刚刚在反右斗争中火线入党的我的嫡亲七婶，突然翻脸。用了整整一堂课的时间，对我这个“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坚持走白专道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剥削阶级后代”，泼妇骂街式地极尽羞辱。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但谁都清楚所指是我。自那以后，从来都是各科老师骄傲的我，经常无缘无故地被新任班主任揪着耳朵从座位上拉起来罚站，甚至多次被揪着耳朵跌跌撞撞拖出课堂。原来的同班好友突然陌生疏远。以致使我在第二学期，不得不转到母亲任教的40中。

考进水产校后，因为几乎无时不在饥饿中备受折磨；因为长期以来，老师一两一个的馒头，比学生二两一个的还大；因为专业课老师不清楚不同池塘的鱼产量为何会有巨大差异；因为那个政治觉悟很高的专业基础课老师经常忘了该轮到他给我们上《水生生物学》，以致全班40几个同学不得不多次百无聊赖地自习……懵懵懂懂的我也仅仅在同学们牢骚蜂起时，附和着骂了一句“这个垮杆学校”，第二学年学校压缩时，各科成绩一直在全班数一数二的我就成了唯一被宣布休学一年的持有城镇户口的学生（其他被压缩的都是由长寿县农校转到水产校或户口在农村的同学），到了长寿湖渔场。在人生路口彷徨的我，因为几首短诗得到名气颇高的右派诗人（曾经被老人家在接见臧克家时称为“自己人”、“红小鬼”）孙静轩的肯定和鼓励，我以为从此就有了生活奋斗目标。在一个前水产校老师的“关怀”和循循善诱下，将自压缩到长寿湖以来的心路历程，与孙老师的交往，和盘托出。不久，在捕鱼队的社教动员会上，就是这个当时已是捕鱼大队副队长的老师，突然收起了平时总挂在脸上的亲切微笑。满脸黑霜地，虽然没有点名，却一直恶狠狠地直盯着我说：“我们只培养普通劳动者，绝不培养精神贵

族，决不让那些口口声声称右派分子为老师的人，轻松过关！”不久，在全场社教动员会上，我就被党委书记王磊直接点名，称之为“被右派分子拉过去了的小青年”。幸好经高人指点，整整忍饥挨饿地装病半月，才在人事科具体经办人佯装不知的同情和暗中相助下，以“因病自动离职”，及时逃回重庆。躲过了此生以来的第一次劫难。

就在我离开长寿湖不久，和我一样同渔场右派们交往密切，但“情节、性质”远不及我的两个朋友：肖顺伟、莫德仲，先后被冠以“破坏生产”和“企图叛国投敌”的罪名逮捕。肖顺伟被送到峨边农场劳教。1976年夏季，在解放碑贴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遭到全国通缉的“川人”，就是这位仁兄。莫德仲在永川茶场劳改期间，从1970年到1971年林彪事件正式传达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对多次所谓“叛国投敌罪”提起上诉，被茶场军宣队定为“抗拒改造的死硬典型”，戴着脚镣手铐在长、宽、高都只有一米的石窟笼子里，不能躺下，不能站起，吃饭，睡觉，拉撒都在其中，关了一年多。据说、军代表原本准备在国庆后将他加判为死刑，因为林彪事件突然发生，他才幸运地没有加入那个年代无以数计的冤魂大军——这些事都是肖顺伟和莫德仲于出狱后对我亲口所述，曾经令我在愤愤不平之余，庆幸不已。多年来，我一直对当年那位及时暗示指点我的右派老师。心怀深深的感激，但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是否健在……

一天早上，据说是接到了县里的紧急通知，王秀廉一早就去了县里。显然是去听林彪事件的传达报告。下午接近下班时，远远看见他沿着小路走来，我顺势放下锄头坐在路边，冷冷地注视着他一路走来，他也佯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似地从我们身边急步走过，连路边几个女知青亲热讨好地向他问好也一反常态地顾不上回应。

次日全场传达文件，我兴冲冲地提着竹椅来到会场时，王秀廉早就坐在办公桌后面，在我既有点幸灾乐祸又满是鄙夷的凝视下，他似乎胸有成竹地不动声色。当全场基本到齐，即将开始宣读文件时，王秀廉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指着我命令道：“黄晓龙，这个会你不能参加，马上去厨房帮厨。”

“为啥子？凭啥子？”我好不容易才控制着自己，没有让“你以为还是你的林副主席在位的时候吗？”这句话冲口而出。王秀廉则得意洋洋地微笑着一字一顿回应：“这是渔场党支部的决定。”正当我准备继续争辩下去时，彭业臣不知什

么时候已站到面前，“老黄，这是为你好，我也同意了。”见我愣在那里，老彭又说了一句：“老黄，听我的，去厨房。”说完就转身回到会议主持桌边。见事已至此，抗争、大闹、显然无济于事，我只得抑住满腹怒火和忐忑，颇为不甘地去了厨房。反正你再也不能把老子打成 516 分子了，过不了几天你就得滚蛋。

伙食团当时有三人，一个是两年前到渔场的转业军人，一个是自到渔场以来一直在伙食团当炊事员的裘海柱，还有一个是犯有“生活作风错误”，外号叫“窑猪”，被“暂时挂起来”安排在厨房的知青。这天、裘海柱也被安排听传达。显然、让我顶替裘海柱，接受和“窑猪”一样的“政治待遇”，是王秀廉有意安排的羞辱，更是向我传递“黄晓龙，你的命运照样捏在老子手上”的威胁暗示。

接近中午，正当我们手忙脚乱地抬饭甑子、舀菜时，裘海柱听完传达回来了，一只脚刚踏进门，就喜气洋洋地大声喊我：“鸡娃（笔者外号，技术员之谐称），熊书记叫你马上去一趟！”说完就夺过我手上的铁瓢，把我推出厨房。我知道肯定是好事来了，谢过厨房几个人，就往办公室赶。

办公室里，熊书记和彭业臣两人正在低声商量着什么，见我站在门前，熊书记第一句话就问：“老黄，林彪叛国投敌的事情你知道了吧？”为什么问这件事？是不是王秀廉又在搞鬼？我急忙摇头装出一付迷茫害怕的样子，深恐两人会由此追查消息来源（自从在甘让那里得知消息后，我没有向渔场任何人透露过半句。在渔场我不敢相信任何人）：“你说的是林副主席？林副主席怎么会叛国投敌？”熊书记和彭业臣会意地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彭业臣笑着开了腔：“是这样，下午还要学习林彪叛国投敌的文件，明天就召开野心家林彪的批判大会，你下午参加学习后，就抓紧时间写批判稿，准备明天发言，没问题吧？”

我心头顿时一松，原来如此；这显然是一种补偿，一次表态，一次无端被剥夺的权利的回归。或者干脆就是对我这个已经被“组织认定”，只等批文下来就立即打入地狱的“516 分子”，没有平反的平反和正面肯定。在工作组进驻渔场的几个月里，一直很少见熊、彭二人在有关运动的大小会上露面。显然是看不惯王秀廉那一套搞法，那一副德行。安排批判大会发言，无异是对王秀廉那一套的否定。而更意味深长的是，这也许就是一次对当时已经左得不能再左的政策方针，难得的矫正。至少、这个人人自危，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恐怖局面，无论怎样都得有所松弛。

见我楞在那里，老彭拍了拍我的肩头：“老黄、走、吃饭了。”

刚向伙食团走出几步，突然想起住在和办公室只有一墙之隔的王秀廉，他肯定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谈话。几个月处心积虑的谋划眼看将毁于一旦，此刻他心里肯定不好过。此刻欣赏欣赏这个迫害狂的沮丧和失望，肯定是一大快事。不然几个月的忍辱含羞，惊恐忐忑，岂不太委屈了！走近离他窗口仅 7、8 米距离的一棵黄葛树前时，见他正全神贯注地在看一份材料。但凝神细看才发现；不对！那张清水脸已胀成了紫色，捏钢笔的手也在微微发抖，哈哈，到底是气得不轻。如果他此刻得知，一旦他将我打成了 516，我就会不惜一切代价先取他的性命时，又会作何感想？我想，他应该庆幸才对。是的，托“林副统帅自我爆炸”之福，老子幸免了一场决定生死的无妄之灾，王秀廉也捡回了一条命。这应该是两人的共同运气。不过，老子还得逗逗你；我干脆坐在树下对着他的窗门，大声唱起刚刚流行起来的“满天乌云哎嗨哎嗨哟，风吹散哎嗨哎嗨哟，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晴呀嘛晴了天……”反反复复，不休不止就是那几句。

(右图：黄晓龙文革后期留影。)

开始王秀廉不时抬起头，用那双三角眼狠狠看我几下。见我根本不理，越发唱得起劲，就开始起身在房里走来走去，其间，几次把手伸到门上又缩了回去。最后他干脆关上窗门、拉起窗帘，拿着碗筷走到门边，狠狠盯了我好一阵。见我不仅越发唱得起劲，甚至还满脸微笑地向他点头致意，才只好拿着碗筷快快离去。我则一路尾随他，改唱着节奏颇有点欢快的《打起手鼓唱起歌》，直到他走进食堂。好些正在路边吃饭的知青有的一脸不解，有的则明知故问地打趣：“鸡娃，你今天是不是吃了笑婆子的尿？”而我则回以从心头溢出的一脸灿烂。



下午继续学习有关文件。由王秀廉一句一顿念了将近四个小时。尽管昨天就从甘让那里得知了主要内容；但听完全文后所产生的震撼、启迪，即使用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来描写也显得苍白空洞。以前一直公认为是老人家最忠诚的学生，战友，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接班人，竟然转身就要对老头子谋反甚至“叛国投敌”，这说明了什么？建国以来，从反右、反右倾、四清到文革，反复演绎着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的悲剧和浩劫越演越烈。同事、同学、朋友之间，构陷、叛卖、

告密、报复就像瘟疫一样无处不在。当年斯诺笔下那个“最有活力，最有朝气”的“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竟然变成了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的地狱……

当晚，我几乎是一气呵成地完成了批判稿。在第二天的批判会上接连赢得数次热烈的掌声。在这些每次都持续了数秒的掌声中，满脸不快却又无可奈何的王秀廉，也不得不敷衍式地拍了几下巴掌。

批判大会中出现过一个小花絮；还是那个窝囊可怜，时刻不忘关注我的毛副场长。当我读到稿子中林彪的流毒甚广，“助长了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和品质败坏者，捕风捉影，罗织罪名陷害同志，以达到满足个人野心和权欲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极大地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涣散了革命斗志”时，这个毛副场长突然阴阳怪气地冒了一句：“大家注意啊，有人又在放毒了。”令会场突然愣了似地静了片刻，我知道自己这段话无论怎样都挑不出骨头，就故意停下来，一边直直盯着毛副场长，脑子里飞快地比较权衡着，如何借机教训这个小人的。也许是他突然意识到，平日里这句对标榜自己的“革命警惕”和“革命觉悟”不无好处，甚至还有可能轻轻松松“再立新功”的惯用语，此时不仅牛头不对马嘴，只须有人稍加发挥还可能引来大祸加身，顿时眼里就透出阵阵怯意，继之又脸色苍白一头大汗。见状，我心里顿时一软。趁还没人反应过来，急忙假咳几声把局面掩饰过去。而此时，心不在焉的王秀廉也没有过问和干涉的兴致。

批判会后的第二天，王秀廉就再也没有在渔场露过面。他是何时离开的？临走时是何种表情？没有人谈起过，连我也失去了关心打听的兴趣。据说他的被盖蚊帐是在一个星期后，由渔场领导安排伙食团采购员顺路带回县城的。

**作者简介：**黄晓龙、1943年出生，1959年初中毕业考入重庆水产校，1961年被压缩休学。先后在重庆长寿湖渔场、大竹乌木渔场参加渔业生产。文革后，在大竹县农业局、达县农学院及重庆从事渔业科研和生产。曾应台商之聘赴西非指导发展养殖业，也自己开办过水产研究所。在钻研水产及相关生物技术之余坚持文学写作。高级养殖工程师。已退休。本文节录自作者回忆录《血色岁月——清队运动后的大竹乌木渔场》，标题和小标题是本刊另拟的。

---

## 【乱世民情】

### 宣叙调——妈妈

戴为伟

妈没有太多文化。她读小学5年级时，家里揭不开锅，被迫退学了。

妈在23岁上和爸结了婚。在妈眼里，爸有学问，待人宽厚，相貌英俊，尽管他是个“大右派”。

1966年，文革还没开始时，妈26岁，爸在共产党的劳改农场已被改造两年了。眼瞅着一个少妇抱个不到1岁多的孩子早出晚归，辛苦劳作，街坊小脚的老妇人动了恻隐之心：“闺女，跟他离了吧，这多怎是个（尽）头儿啊，何苦呢！我给你说个主儿，在大学教书的，哪点儿都不比现在这个差，人家还不嫌你有孩子，趁着孩子不记事……”妈礼貌地笑笑，摇摇头，婉拒了老街坊的好心。

文革开始了，妈请地主出身的南屋邻居吴姥姥剪了自己的发辫，老太太拿着剪刀，摇着头，半晌下不去手：“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头发……”妈拿了那剪下来的乌黑发辫，在院门口递给了收废品的，那人拈开拇指、食指量了量，木杆秤称了称，给了妈4块钱。那时候，妈一个月挣28块钱工资。

这时，我们那只住了8户人家的小四合院已经乱了起来。北屋的胡阿姨被自己大女儿造了反。不到20岁的，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闺女，亲手赏了自己亲娘两个大耳光。被剃了阴阳头的胡阿姨，闷声坐在自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发呆。

晚上回到家，拉上窗帘，妈挪腾起爸的几只旧箱子。挑挑捡捡，捆捆掖掖，爸的一些笔记本、有字的稿纸重又放进箱里，推到破木板床下墙犄角。妈又挑出一些旧书、字画，摆在我家那没有抽屉的小二屉桌面上。

离院子不远，有所因造反使“五类分子”们胆寒的女子中学，草绿军装，腰扎武装皮带的女红卫兵来破四旧了，妈没等她们动手，主动配合，交出了桌上的旧书、字画。院子里，革命小将一把火，烧了那些个封建残余。很多年后，妈对我说：“还好，没人把齐白石的画掖走，我亲眼看着他们烧的。唉，只可惜了咱们家的齐白石啊，我带着你，揭不开锅时都没舍得卖呀！”

冬天的一个晚上，要睡觉了，有人轻轻敲我家窗玻璃。妈掀开窗帘一角看了看，迅速开了门。西屋的右派老婆杨阿姨和北屋的历史反革命家属胡阿姨进屋了。她俩找妈商量着，一齐到派出所去办离婚吧，和自己的右派、国民党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也许能对孩子们的前途好些呢？

妈摇摇头：“离婚了，孩子们就不是右派、反革命的孩子了？反正我不去，我劝你们也别去。”

自我记事，每天晚上，妈总是坐在床上，边给我念书，边打毛衣。那毛衣基本都是给工厂同事和他们的孩子织的。等我大些，妈唠叨过：“这样大家能对我好些啊。”

1967年，爸可以每月从劳改农场回家两天了。一天，我爬床、上桌去够一摞箱子顶上一大堆毛线团里的塑料娃娃，哗啦，毛线球散了一地，我抓起娃娃就要出门，爸很生气，瞪着眼，一堵高墙样挡在我面前：“为什么不捡起来，为什么！”正在门口小炉子上做饭的妈赶忙进来，一边捡毛线，一边埋怨爸：“你捡不就得了，再吓着孩子！”

下午，爸妈带我去逛街，爸要拉我手时，我跑到妈身边。妈很细心：“还生你爸气呐？得了，让你爸给你赔不是。”爸笑嘻嘻地：“好，好，爸爸不对，爸爸

不对。”拉起了我的小手。这天，在西单的东方红照相馆，我们照了自爸妈结婚来的第一张全家合影（见左图）。



爸回农场了，早晨，妈拉着我去幼儿园的路上，我家附近几个半大的孩子不怀好意地看着我们，忽而一个男孩喊了声“开始”，零星的小石块投了过来：“打你个大

右派的小老婆，小老婆！”妈一把抱起我，头都没回，加快了脚步。

1969年仲夏的一个傍晚，西半拉天空红得可怕，妈匆匆赶到太婆那里领我回家，老人家拦住了娘儿俩：“缓些吧，要下大雨啦。”说着话，西北天空厚厚的黑云压了过来，强烈的闪电撕扯着天空，一阵狂风，四合院的灯倏地全灭了。我扎在妈妈怀里，恐惧着窗外惊天动地的风雨。雨刚停，妈抱着我趑趄在没过小腿的冰冷雨水中往家赶，路灯下，水里满是小乒乓球样的冰雹。

终于到了自家十平米的小东屋前，我和妈呆住了，门窗上的玻璃大半碎了。拉开已经没有玻璃的门，距窗户仅一米的床铺上满是玻璃渣，妈小心地让我站在浸了一地雨水的屋里不要动，捡拾被冰雹打到铺板上的碎玻璃，卷起还有小玻璃碴的湿床单，又找出些旧油布钉在门窗框上，娘儿俩在半湿的床上安歇了。

1970年初夏，爸被机关枪押送去山西劳改营已经半年了。

这天妈下班早，领着我在街口上的副食店排队买青菜，一个腆着大肚子的半熟脸妇女晃到我们面前，瞥了妈一眼，眼皮垂向妈隆起的肚子，扬扬下巴颏：“这个——还是戴煌的吗？”妈侧起脸，扫了那妇人一眼，一只手支在后腰上，另一只手缓缓摸着自己的肚子，面无表情地嗯了一下。晚上，妈在家织着毛衣淌下泪来，“妈妈，你怎么哭了？”五岁的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妈静静地抹干泪水，帮我掖了掖被子，“没有，妈没哭，快睡吧。”

这天傍晚，还有个把月就要临盆的妈，站在家门口和地主婆吴姥姥家的二孙女聊起天：“给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呢？为伟她爸来信说，我在山西，你娘几个在北京，快出世的孩子叫京晋吧。”

“也成，要不再找个更好听些的？”刚上中学的吴家老二拿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了。

“我看京晋不好，我们娘儿几个以后还不得都跟着去山西呀，还是叫晋京吧，让她爸托这孩子的福，早点从山西回北京吧。”妈带着期盼给还未降生的孩子起好了名字。

妹降生第57天，妈得去上班了。妹进了街道的托儿所，妈把六岁的我独自留在了家里。

妈没有时间给我念书讲故事了，每天回到家，做饭、洗尿布、缝补破旧的衣服、给爸写信，帮同事织毛衣。夜晚，我家永远是小院里最后一个熄灯的。

渐渐的，妈开始跟我叨念起工厂的事了。

妈在工厂是另类，可这并不妨碍她也有高兴的时候。要涨工资了，这是天大的事。那些日子，工厂的人们打听、传播着各种与工资有关的小道消息。三级工资的占60%，二级工资的30%。“这回你能涨到三级工工资，没什么问题。”拿着妈刚织好的毛衣，工段上的杨班长提前告诉了妈这个好消息。

妈吃了定心丸：“是啊，也该轮到我涨工资了。涨工资就看干活呗。我是建

厂那年第一批职工，我们车间年年都是厂里的先进车间，去年还成了区里的生产先进。我是这车间的第一道工序，我不超额完成任务，哪里来的先进？这么多年不评我先进，是因为你爸。说领导不信任我吧，每回节假日值班都有我，那会儿他们从不提我是‘大右派’家属。车间这次新来了 10 个学徒工，让我一个人带仨。这回涨了工资，我每月就能存 3 块钱，你爸回来过春节就不那么紧了。”

我被妈妈的期待感染着，也盼着涨工资那天早点来。

“明天下班后开会，我晚回来，你看好妹妹，不要在街上瞎跑。明天重要啊，正式宣布涨工资的名单。听话，等妈妈的好消息吧！”

第二天，天黑了很久，妈才进家门。昏暗的滋滋作响的 8 瓦日光灯下，我看到妈静默悲哀的脸，她的眼帘有些肿，寒风中哭过的样子。“妈——”我怯怯地叫了一声，忐忑地瞅着她。妈有气无力中夹杂着烦躁、愤懑：“把窗帘拉上，这么晚了，四敞大开的干嘛！”

妈颓唐地坐到大床边，一脸茫然、一语不发。我迟疑着悄悄立到妈妈跟前。妈抬起哀伤、茫然的眼，望着面前一双幼小的女儿，嚤嚤地啜泣起来：“明明是念三级工的名单，前后都是三级工，把我夹在中间，念名单的头头还停了一下，就说我是二级工了，可又没把我放在二级工的名单里。这肯定是临时改的，临时改的……”

……妈只能认了这比别人短了一级的工资，妈只能在家叨念着怨恨、愤懑和不平等。

妈妈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她经常胃痛、头痛。很多时候，妈手揉着胃，佝偻着身子，踉踉跄跄进得家门，径直扑倒在床上，团缩着身躯止不住地呻吟。我拉着妹的手，看着痛苦不堪的妈，不知所措。

请病假，多么不容易的事呀，工厂医务室的张大夫最瞧不起“大右派”的家属了。妈到医务室，看到的永远是张大夫冰冷的脸，即使妈发烧到 39 度，也只是给几片退烧药。开病假条，转院，门儿都没有！

一次，妈妈开摇臂钻，一粒刚镟下来的铁屑溅到妈眼睛里，徒弟们慌忙送她到医务室，张大夫在妈眼睛上鼓捣半天，妈已经疼得不成了。徒弟们在旁边加着十二分的小心，陪着笑脸谦恭地请求着张大夫：“您看，能不能转到医院眼科去？”

“这点儿小毛病，至于吗？”张大夫脆生生地准备回了徒弟们的请求。

“这眼睛……可……”徒弟们再三请求着，张大夫终于住了手，悻悻地去开转院单了。

妈没能入了工会。地富反坏右的家属怎么能加入工会组织呢！不知为什么，妈不再宽容温和了，她变得爱较真起来。妈妈在乎起入工会这件事：“我又不是五类分子，我只是家属，每次填表，成分也是工人。为什么不让我入工会，我有什么错，要不把我也划成五类分子得了！”妈找到车间主任，找到工会，找到厂长，和他们争执。可，没有结果！

望着孤苦无援的妈妈，我和妹妹能说什么呢！我也不能加入红小兵，我们长大以后……或许妈妈的命运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也要背负一生一世与“右派”有关的惩罚么？苍天造物不公平啊！

刚入冬的一个下午，妈妈突然昏倒在车间里，人事不知。这次妈妈年轻的徒弟们没送她去医务室，而是借了辆平板三轮车，七手八脚把她送回了家。

妈妈很快转醒过来，吃力地打发徒弟们回厂上班去了。

我放学回来，家里的火炉灭了，妈妈躺在床上，气如游丝。四岁的妹乖乖地坐在床边的小板凳上，慢慢翻着一本掉了皮的小儿书。

我重新烧热炉灶，默默地熬起白菜帮棒子面糊糊。

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妈呻吟着低声唤过我去：“你过来，那些先不要弄了，我有几句话告诉你。”妈哀伤的眼里矛盾着绝望和希冀。

“记住妈妈的话，不管到什么时候，带好你的妹妹。山西那边，你爸爸这辈子可能回不了北京了，他在那里很苦。如果到你 16 岁，我还活着，我就去山西找他。你答应我，管好妹妹，不要受坏人欺负。再过几年，你和妹妹就要独立生活了，我实在管不了你们了。如果我活不到那时候……你不要哭，让人听见笑话。如果那样，你就自己带着妹妹

去找你们爸爸。唉，你爸爸那里不好呀，队上的干部坏透了，专门欺负人家的女孩子。我是想坚持活下去，看你们姐俩长大呀！”

(右图：全家 1971 年留影。)



妹也哭了起来。院子里，下班的街坊开始做晚饭了，似乎没有邻居理会，在这个大杂院的一间小屋中，还有母女仨正在她们生命的旅途中痛苦地挣扎着。

妈躺了两天，去上班了。我的天空好像又透出了一缕阳光：妈妈不会死的，爸爸也不会。我在心中默默祈祷着，盼望冥冥中，上苍能听到一个 10 岁孩子心底的乞求哀告。

又一个夏季在我提心吊胆中慢慢地过去了。妈妈似乎越发神经质起来。她每天都要吩咐我，不要忘记去看院门口的信报箱：“中午、下午放学都要去看，不要叫别人把你爸的信拿走了，外院的驴很坏，他会偷看我们的信！”

“你爸怎么两个星期没来信了，不会出什么事吧？唉，我希望走在你爸的前面。”只有三十四、五岁的妈经常会想到死。

中秋后的一个下午，放学后，我边玩边往家走。同院的孩子急忙忙从大杂院方向奔了过来：“为伟，你快……快回家，你妈……又被送回来了，一直闭着眼！”我心骤然紧成一个疙瘩：妈妈！妈妈真的不行了吗？！妈妈，妈妈，我心里颤抖着、呼唤着，飞奔进大杂院。

家门大敞着，门口围了许多邻居，甚至还有胡同里的街坊，正在七嘴八舌，见到我，倏地，散了。家里，盖着一床棉被的妈妈直直地躺在床上，脸白得吓人，眉头蹙着，紧闭着眼睛，嘴唇微微抖着。两个年轻的女徒弟，不安地坐在小床上。我扑到床前，抓住妈露在被子外面的手，小声急促地呼唤起来：“妈——妈——，你醒醒……”

半天，妈睁开眼，似乎看了我一下，开口了：“小韩呐，你吃中午饭了吗？听说下班又开会，不能请假……”

“妈——，妈——，是我，是我呀！”

“我知道，你看你，工会入会的事批下来了吧，你甭瞞我了。”妈叹了口气，又闭上眼，不再搭理我。

妈不认识我了！我的脑顶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捶了一下，呆了下来。

天傍黑了，妈妈的男徒弟从幼儿园接回妹妹，和守在家里的两个女徒弟商量起来：“你们俩在这儿守一宿，明天我和小韩来换你们，你们女同事晚上方便些。”晚上 10 点多了，女徒弟俩坐在小床上，妈突然温柔地笑了起来：“你回来了，你怎么这么久不来信，我和孩子担心死了。瞧你这衣服，也不补一补……”

第三天头上，妈睁开眼睛看了我一下，微弱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为伟，你怎么没上学？”

“妈妈，你醒了！”我不知该说什么，呜呜地哭了起来。

徒弟们高兴地围拢上来：“潘师傅，潘师傅，好些吗？喝点水吧。”

妈妈醒了，徒弟们不敢再耽搁，回车间上班去了。临走，悄悄嘱咐我：“有什么事，赶紧叫我们，甭着急，看好你妈妈。”

躺在床上的妈妈唤过我去：“为伟，我真的不成了，看好你妹妹，赶紧给你爸写封信，让他回来吧。咱们一家，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懂吗，孩子！”我使劲点着头，又呜呜地哭了。

妈妈已经没有了眼泪：“不要哭，孩子，记住，你爸爸没回来之前，工厂要来人送我去医院，你就拦着。记住，妈妈能顶到你爸爸回来。像美娟妈那样进了医院就更坏了（美娟爸是反革命，美娟妈进了精神病院），知道吗！”妈妈完全清醒了。

做晚饭的当口，我去倒垃圾，胡同里叫不上名字的一个大妈拦住了我：“呦，还没吃呐？”我好生奇怪地站了下来，不知她要说什么。

“哎，你妈好点儿了？”

“啊。”

“哎，她——，什么病呀？”

“哎，因为什么呀？”这时又有同院的几个妇女围上来：“哎，我们看，今儿工厂的人都撤了，你妈徒弟吧？哎，你妈怎么了？”

我有些惶惑：“我妈挺好的，工厂里老欺负她，不让入工会，老批判她，也不给涨工资，有病也不能休息……我妈又不是‘右派’！”我气愤起来，还要继续说下去……

“呦——，瞧瞧，瞧瞧，啧啧，太——想不开了，就为这点儿事，真是……”街坊邻居们散了。

……

大约 10 天后，我收到了爸爸的回信，他正在焦急地等待劳改营准他假。

---

## 【文革起源研究】

## 高校录取中的阶级路线

### ——文革根源浅析

杜钧福

十年文革，打倒一切，几乎所有党政部门都被冲击。在文革开始就首当其冲而后来又彻底打倒的，是所谓“三旧”：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此外还有高教部。

根据我的研究，除去意识形态的问题，北京市委、高教部，也许还有中宣部，它们被打倒，有一个要害问题是高等学校录取的阶级路线问题。这个问题说大了，就是“革命事业”由谁接班，或者说，若干年后，由谁继续掌权的问题。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列出文革前 9 年全国高中毕业生的数量、高等学校录取人数，以及录取比例。其中有的录取比例高于 100%，是因为包含往届毕业生和同等学历者。

年份	高中毕业生人数（万人）	高校招生数（万人）	录取比例（%）
1957	19.4	10.6	54.6
1958	21.9	26.5	121.0
1959	30.0	27.4	91.3
1960	29.0	32.3	111.4
1961	37.9	16.9	44.6
1962	44.1	10.7	24.3
1963	43.3	13.3	30.7
1964	36.7	14.7	40.1
1965	36.0	16.4	45.6

( 周贝隆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教育——国情·需求·对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

按照录取情况，这九年可分为三段。在 1957 年和此前，高校录取比例较低。

这在当时并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原因是相当多的家庭因经济困难不能支持孩子继续求学或需要他们挣钱养家。当时各项事业发展，高中毕业生甚至初中毕业生就被视为知识分子，就业并不困难。我的两位同学，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一位被新华社录取，负责处理人民来信；另一位在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他们继续求学，毕业后未必能找到这样理想的工作岗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并不认为中学毕业后一定要上大学深造才有前途。

从1958年到1960年，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高等教育急剧扩张，成立了一些新的学校，产生录取率高于100%的局面，更不存在竞争的问题。

三年饥荒以后，国民经济凋敝，各项事业滑坡，1958年新成立的高等学校纷纷撤并，而高中毕业生数目由于惯性不降反升。从1960年代初开始，就造成了升学的竞争局面，高等学校录取率低于50%。由于中苏交恶，高中毕业到苏联留学的路也关闭了（1965年为最后一批）。另一方面，各行各业紧缩，精简人员，下放农村，就业的路子窄了。在很多高中生看来，升大学成为唯一的出路。那么，究竟是谁应该通过这独木桥进一步深造，谁又应该成为普通劳动者？

我国从1952年起建立了高等学校入学的统一考试制度，同时也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审查制度。这一制度的演变过程可见《中国考试》2009年第1期上宋长琨的文章《文革前高考权利主体的演绎——1953-1965年的高考政审制度》。本文一些资料引自该文。但该文主要根据文献来叙述，不能完全反映当时执行上的趋势。

在1957年以前，政审制度并不严格，对绝大多数考生未发生实际影响。反右斗争运动后，特别是从1958年起，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加强政治审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优秀高中生失去升学的权利。这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家庭出身不好”者，其代表为遇罗克；二是在政治运动中“表现不好”者。1958年在全国各地很多高中开展“整团”的运动，整了一批学生，使他们从一进入社会就背上历史问题的包袱，影响了他们一生。而在四川这样的地方，更是在中学里开展了不叫反右运动的反右，打了一批不叫反革命的学生反革命分子，送去劳改。（**王建军**主编《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纪实》，2007）

大饥荒以后，政治运动降温，政治审查制度有所调整。根据我的记忆，1961到1963这几年，高等学校录取情况比较合理。1962年，出台了一项新的政审标

准，对过去规定有所放宽，但只执行了一年。

八届十中全会后，重提阶级斗争。这种极端的阶级斗争理论在 1964 年的高考录取上表现了出来。在这一年，“出身不好”的高中生几乎全不被录取。而同年送了一批高中毕业生去西欧留学，几乎全是高干子女。

但是从 1964 年到 1965 年，在中国政坛上发生了许多事。这些事，宏观看来，是极端阶级斗争理论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所谓不稳定，是指领导所制订的政策及所依据的理论在执行过程中引起执行者或涉及的社会阶层的互动，以党内斗争形式表现，并反过来影响政策的制订。

从 1963 年起，先在农村后在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在农村的四清运动中，无论是执行前十条或后十条时期，都重建阶级队伍，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作为依靠力量。1964 年开始的北京大学四清运动，工作队进校后也执行阶级路线，依靠出身好的师生。在 1964 年前后，这种极端的阶级路线，不仅表现在高等学校入学标准上，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一角落。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北京的中学里爆发了所谓“四六八学潮”。1963 年北京市的一些重点中学开始了四清。在这些学校的领导层中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了激烈的清理，在学生中也展开了贯彻阶级路线，清理白专学生的运动。一些学生已经被内定为白专学生，大学不得录取。“学生以阶级出身划线，分为三六九等，一批人整另一批人；学校引导学生，特别是家庭不好的学生自我批判，大胆暴露各种错误思想，愈来愈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凶险。”（裕雄《良知与责任——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炎黄春秋》，2006 年 8 期）

在当时的形势下，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一条是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

这一学潮称为“四六八学潮”（刘小萌《中国知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引起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

预演。同一时期，宣武区的北京师大附中的8名高干子女认为党支部烂掉了，校长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活动被北京市委支持的学校当局压了下去。

和以前的“右派”不一样，这样的学潮是一种“左”的学潮，为共产党执政以来首次发生，也迅速被瓦解，而且要在三所中学里各抓出一个“反动学生”来。一些参与学潮的出身不好的学生就成为批判的对象，虽然这样的学潮所代表的是高干子女的利益。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进言书的内容中，只有成立共青团以外的类似贫协的“阶级组织”是有悖于当时的政策的。很多学校进行了教育改革，一些学校里搞了四清运动。一些中学里的干部子女则已经秘密成立了类似农村贫下中农协会的组织，被当时的北京市委作为非法组织取缔。这些组织，实际是文革中红卫兵的雏形。

可能是对这样的学生运动的一种反弹，认为这样极左的阶级路线不符“重在表现”的政策，北京市及教育部门的领导在1965年对升学问题又有所调整。在这一年的政审文件中，明确规定不能搞唯成份论。像北京八中学潮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父亲死在劳改农场的查建中居然能在这一年考上清华大学。(晚晴《查建中：留住真诚》，人民网，2004)

北京市和教育部门在1965年对“阶级路线”有所调整的另一背景是党内斗争。1965年初，《二十三条》公布后，对北京大学原工作组的路线进行批判，就包括阶级路线在内。1965年3月19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在给北大四清工作队的报告中要求认真检查唯成份论问题。6月29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对北大党员干部和工作队员做报告，讲了8个问题。第7个问题，就是“重在表现”。他说：“过去我们提团结90%，现在提团结95%，就是把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子弟包括进来，这是个战略方针。”而蒋南翔在清华还提要团结100%，真发现敌人再处理不迟。

比较来说，当时北京市委和教育部门对政策的纠偏更为合理，也代表共产党的长远利益。但是许多领导干部作为家长，像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所关心的是自己的孩子能不能考上北大清华的现实问题。几乎可以肯定，这些措施引起干部子女及其娘老子的严重不满和对抗情绪。日后北京市和教育部门的领导都为他们

的作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上述将入学政治标准问题和文革在北京市和教育部门发动联系起来的说法，当然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是文革开始时从报纸、工作组和红卫兵，都对彭真的“阶级路线”进行了清算。从对待中学红卫兵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些高级干部如何评价教育部门现状和他们的立场。

在研究文革开始阶段的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时，往往着力于分析红卫兵成员的思想轨迹，而忽略他们作为十几岁的少年所受他们的家长的影响。不久以前公开的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信息(宋柏林《红卫兵兴衰录——清华附中老红卫兵手记》，转引自《乐趣园》，2007)。

例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宋柏林在1966年6月4日的日记中说：“上午与爸爸谈了学校的事。爸爸很支持我们，并答应明天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并说：‘有必要时，我也可以给你们贴一份大字报，支援你们嘛。’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很气愤，说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把我们恨之入骨，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早把你们杀光了，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他的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宋维栻。后来红卫兵对文革前学校的看法实际上是一些家长的想法。在红八月里，一些干部子女仇恨、虐杀老师，和他们家长灌输仇恨的教育有直接的关系。

6月5日的日记中说：“上午爸爸和伍秘书、小陈一起来到我们学校，对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凡是找到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他所说的熊钢，是熊向辉的儿子。6月19日的日记中说：“我们得到那么多老干部、各校干部子弟的大力支持与鼓励。”

这几位老干部不是很大的官，但都掌握着要害部门。据说在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打倒彭真。那么在后面一段时间，这样一些高级干部是否在毛泽东那里给彭真及北京市委和教育部门上过眼药，下过菜碟，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我提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过分。但是我实在难于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毛泽东如此相信北京会发生政变，以至要到南方避难，还叫叶剑英到国外给他买尼龙避弹衣。(戴晴《我的义父叶剑英》，炎黄春秋网，2010)

宋柏林在6月23日的日记中说：“爸爸特地打电话叫我回家谈谈。回家与爸爸谈了许久，爸爸说：在你们这样的学校里，团结95%可能不太适当吧。并说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应敲打。但还是要注意，主要是夺权，是打当权派。对右派学生，你们心里都有底，一个成分，一个文化革命中的表现，就足以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地改造。并说在学校里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当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号召团结大多数，受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强烈反对与批判，并催生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著名大字报。后来，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及串联时期，不少学校的红卫兵将出身不好的同学送到农村劳改。清华附中红卫兵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以及相应行动，和宋维栻的这一指示精神是符合的。

7月27日，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刘晋到学生宋柏林家，想通过宋的父亲宋维栻做红卫兵的工作。当时他还不知道毛泽东回京后的形势，也想不到他的话还没讲完，宋维栻就打断他的话，神气十足地说：“工作组为什么不能反？团中央为什么不能怀疑？”（刘晋《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炎黄春秋》，2008年5期）可见，反对工作组的，不仅仅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

宋维栻在他的谈话里提到对“右派学生”要“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乃是问题的要害。正如上述宋长琨文章所说：“对高考权利的垄断心态，被包裹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外衣；阶级斗争的话语诉求，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独占欲。”他们所希望的，当然是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实行这种极端的阶级路线，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权力传承的种姓制度，但首先急迫的是从高考制度开始。

反右以后执行的政审制度剥夺了一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升学机会，符合他们的利益。然而他们发现这样的政策仍不足以保证他们的子女能顺利地升学，仍然要和那帮“狗崽子”在考场上竞争，因而需要更左的政策。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极左路线和政治运动符合他们的这种愿望。但是北京市委、高教部，或许还有中宣部在1965年的政策调整遏制了这一倾向，理所当然地在文革的第一波中首先被打倒。这是文化大革命从北京市和学校里开始的深层原因。

本文在阐述文革产生的社会背景的时候，当然不排斥其它文革根源的分析。应该指出，文革当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在党内存在广泛的思想基础，说从文革开始时就受到广大干部的反和抵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此外，

在探讨文革成因时分析党内不同观念和路线的分歧以及派别斗争当然是有益的，但是不同阶层间为其现实利益而进行的博弈乃是推动社会运动的根本动力。

---

【史林一叶】

## 跨国革命大批判

### ——北京二中批判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

朗 钧

1967年8月，北京城出现了一个“大批判”热潮。各单位、各群众组织纷纷在市区的热闹街头树立大字报专栏，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

北京二中的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兵团”在最热闹地段的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的小广场北侧树起了一个大字报栏。为了选择大字报的内容，“井冈山兵团”召开了会议。经讨论决定批判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

196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排练并公演了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这个话剧反映朝鲜开展的“千里马运动”，表现朝鲜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精神面貌，塑造了“千里马旗手”的典型形象李善子。剧中，李善子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三名落后群众。著名女演员狄辛出演剧中女主人李善子。

为了确定大字报的基调，从某干部子弟家中找来了朝鲜劳动党第四次党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经阅读发现，其中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关论述与刘少奇所作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的阐述，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基本一致。

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将批判《红色宣传员》的基调定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成为共识。大字报文稿很快写成，其中还点了金日成的名；之后，请毛笔字写得好的同学抄成大字报，然后在王府井的大字报专栏中贴出。

大字报贴出后即刻被围观。连续几天大字报专栏前面挤满了观看和抄写的群众。大字报引起的社会效果令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的成员兴奋不已。

大字报贴出第三天，有消息灵通者告知，批判《红色宣传员》的大字报上了大参考。

记得是在大字报贴出的一周后，一辆伏尔加小汽车停在了北京二中的校门口。车上下来两位干部。他们来到“井冈山兵团”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只有几名初中一年级的同学。两位干部自我介绍是外交部的，奉上级指示和二中“井冈山兵团”交涉关于批判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的大字报的事情。要求二中“井冈山兵团”派人和他们一道去外交部。一名姓马的同学和一名姓于的同学跟着外交部的干部坐上了伏尔加。

到了外交部后，他们出示了外交部关于北京二中“井冈山兵团”在公共场合张贴大字报，批判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的大字报的通报。该通报上有周恩来和康生的亲笔批示，周恩来的批示是用红铅笔写的：“请和北京二中的同志商量，覆盖大字报。”（大意），康生的批示是：“同意总理意见”（大意）。在场的初一同学说：“非要覆盖吗？撕了行不行？”外交部干部说：“都行。我们派车送你们去王府井。”

到了大字报专栏处。那里仍然有很多人在围观、抄写大字报。马、于二位同学下车后，挤进人群，到了大字报专栏前。伸手就撕大字报。引起围观群众不满和谴责。外交部的干部连忙帮助解释。群众听后也渐渐散去。

见大字报已被撕毁，外交部干部钻进伏尔加，对马、于两位同学说，你们自己回学校吧。伏尔加一溜烟开跑了。

1969年开始全国范围的“抓516”活动。当年首先提出批判《红色宣传员》的同学经历过若干次专案组的调查，有来自外交部的，有来自中联部的，也有来自公安部的。

1967年5月朝鲜劳动党召开四届十五中全会。正式提出金日成主体思想为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指导思想。而9月就在北京街头出现了批判朝鲜话剧的大字报。当年这张“跨国革命大批判”的大字报肯定给中朝两党和两国之间带来过负面的影响，引起朝方强烈的反馈。但具体情况恐怕只有知情外交官才能说清楚了。

---

【史林一叶】

## [“省无联”是怎样出台的](#)

## ——湖南“省无联”述评之二

杨大庆

### 倒旗与竖旗

1967年秋，在湖南“湘江风雷”派组织日渐自觉地靠拢的同时，“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呼声也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理由很简单：受压越深越革命。湘江风雷造反早，受压深，革命性强，自然有资格当核心。而工联，早就右了、修了，该靠边站了。

工联却很少公开争着当核心，理由也很简单：他们早就是核心了，用不着死乞白赖去争。况且他们不但是核心，而且几乎就是全部。在此时的省会长沙，湘江风雷虽然在长沙纺织厂（缚苍龙）、港务航运系统（卷巨澜）、湖南制药厂（湘药战团）、供电局、长沙水泵厂等大单位仍有可观的势力，但此间的工联实力也与其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而在汽车电器厂、曙光电子管厂、红旗内燃机配件厂、长沙船舶厂、长沙机床厂、湖南橡胶厂、新华印刷厂、建湘瓷厂、省汽车运输公司这些举足轻重的中央、省属大中型企业和人民汽车公司（公交）、邮电等要害部门，湘江风雷或湘派即令有基层组织也是聊胜于无。更不用说在省直机关红勤站对省直联的压倒性优势和省委大院内永向东的一统天下了。

工联的隐忍不发很快得到了回报。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传达后，自下而上按行业、按系统的大联合迅速形成了高潮。而被湘江风雷奉为至宝的“以我为核心”则成了典型的反面言论。9月27日，工联宣布解散总部，表面上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走自下而上按行业、系统实现大联合的道路；实际上是想凭借自己在多数基层单位的优势，以大吃小、一统天下。但工联的意图过于明显。于是湘江风雷在9月27日便针锋相对地发出了《在大联合中不解散总部的声明》。虽然此《声明》也振振有词，但却改变不了政治优势在己“解散”的工联一边的事实：工联不但显示了不争席位、不争当核心的“高姿态”，而且比湘江风雷更紧跟上了中央的部署（对工联的这一举动，周恩来是欣赏的，在其不久后的武汉接见中他就称其大方向是正确的，不过急了点。）

眼看有被工联抢占“政治制高点”的危险，湘派开始了自己的“大联合”之路。他们一方面搬出了“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才能消灭山头”之类来路不明、

似是而非的“毛主席语录”为自己保留山头的行为大造舆论，一方面急匆匆地谋划有别于工联的大联合路线图。

9月28日，由长沙工人政治部代章，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孙大圣挺进军、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6个湘派组织发出通知，邀请各造反组织共商联合大计——工联已解散，自然不在被邀之列。

9月29日上午，部分接到“通知”的组织：东方红总部、红旗军、省教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省直联络站、矿冶井冈山公社、红中会、红工会、长沙虎山行、长沙农联等出席了在解放路三招待所东方红总部由该总部谢国凡、唐志明主持的会议。到会者攻击工联搞的“倒旗联合”是“大解散”的“邪气”，提出“应有条件地由各总部先联合再下基层联合”的方案，并将拟议中的各总部联合组织命名为“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初步决定了按系统设分会、支会的组织原则；当日会议的另一重大成果是通过了《关于坚决拥护 全力促进 誓死捍卫革命大联合的联合声明》（即《9.30声明》），《声明》中称：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在斗争中求联合求团结，他老人家指示：“当前大联合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是造反派内部的风头主义、山头主义，不愿意搞大联合。”我们许多好同志正确地注意了克服造反派内部的缺点错误，但是却忽略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挑拨离间破坏革命大联合的这个决定性因素，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认真贯彻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当前种种迹象表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又将革命口号接过去做反革命文章，力图破坏真正的革命大联合。他们幕后操纵，蒙蔽群众，调子打得极“高”，脸谱画得极“左”，抹煞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抽掉这个伟大历史潮流的阶级内容，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借革命大联合之名行反革命大解散和复辟资本主义之实。他们关在屋子里当“救世主”运动群众，自上而下地搞行政命令，有的单位甚至宣布“谁不参加大联合就不发工资”，将毛主席最高指示歪曲为一个晚上一风吹，甚至

在半个小时内实行“大凑合”，否则就是“派性”、“山头”、“牛鬼蛇神”。他们闭口不提党内走资派在革命队伍内打一派拉一派制造分裂。破坏革命大联合。而是用全部火力对付革命造反派，将革命群众前进中的缺点错误无限夸大，专整左派的风，整得左派灰溜溜，老保又开始神气活现……

这一切是搞革命的大联合吗？否！是不折不扣地破坏革命大联合，是貌似极“左”实质极右派的阴谋鬼计！

……

革命大联合必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灵魂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基础上的联合。联合是有阶级性的，联合在任何时候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只能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

革命大联合首先是政治思想上的大联合。根据湖南当前的斗争情况，阶级斗争盖子还未彻底揭开，在不少基层单位左派还没有占优势，大方向始终正确的湖南红旗军还没有彻底平反，还有人妄图将革命小将打成“反革命”，因此革命群众组织尚未完成历史使命，决不能用革命组织大解散的办法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在当前只有承认山头才能消灭山头，决不能允许歪曲大反山头主义的口号来大反革命群众组织。观点不能混合，只能通过适当的斗争解决矛盾，而不能人为地取消矛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群众运动。

在这个声明上署名的有：湘江风雷、矿冶所鲁迅兵团、长沙工人、红专会、东方红总部、矿冶井冈山红卫兵、长沙虎山行、青年近卫军、红旗内燃机厂《东方红》战团、省教联、湖南红旗军、红中会、长沙南区《9.24》黑鬼战团、矿冶井冈山公社、湘江风暴省革造会下放职工反迫害长沙市总部、省直联络站、体委

红旗、高校风雷、湖南红工会、红导弹、湘江风暴湖南省革命造反委员会、九中重上井冈山。

此声明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在于其不点名地攻击工联搞倒旗联合，并为自己顽固坚持抱团搞跨行业、跨系统的社会山头辩解的陈词滥调；而在于它是湘派组织最整齐的一次集体大亮相。几乎所有的湘派组织（湖南井冈山除外）都通过这个声明站到了工联的对立面。

9月30日上午，会议在东方红总部继续进行，到会单位除日前出席者外，高校风雷、红旗厂东方红战团、长沙财联等也来了。会议重点讨论了省无联的组织条例，决定总会下设总分会、分会、支会。参加省无联的大总部可称总分会，小总部可称分会，各单位设支会，人数太少的可几个合起来为一个支会，此即“按系统按单位实现联合”。总会由现有各总部组成，经选举产生“领导核心”。由于工联总部已宣布解散，欢迎其基层组织参加各单位的支会。会上产生了“省无联筹备小组”，由湘江风雷、红旗军、东方红总部、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长沙工人、高校风雷、红中会、红工会、省直联、长沙农联、长沙虎山行、红旗厂东方红战团、341部队红色硬骨头组成。当时即委派东方红总部的郭冬和去刻了公章。其拟定的日程表“争取（10月）5、6号开成立大会”。

10月1日，“筹备小组”主持开会进行了分工：由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长沙工人组成“政治组”，由红旗军、长沙虎山行、长沙农联组成“组织组”，由高校风雷、红中会、省直联组成“宣传组”，由南区“9.24黑鬼战团”、毛泽东思想捍卫军组成“联络组”，由青年近卫军、红工会组成“保卫组”，由长沙财联、军区联总组成“后勤组”。会议委托刘荣华（高校风雷）负责起草省无联“成立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和“组织条例”。

10月3日晚，在孙大圣宣传部召开了又一次会议，会议除了发泄对省革筹、47军的不满，咒骂工联并以“长沙道路”自我陶醉外，就是不着边际地议论日后与省革筹的斗争，基本没有正式成果。

10月4日晚在五中青年近卫军总部又开了一次会，一如昨晚，又是一番高谈阔论，诸如“工联解散了，他们蠢得很”，“长沙走北京道路走不通，我们要走长沙道路”之类。但该晚会议有一项决定日后被证明是实行了的，那就是在省无联正式成立前就把“成立公告”发布出去，以扩大影响。

10月5日，在东方红总部由柳枚青主持召开了一次颇为正式的会议，会上选举湘江风雷、红旗军、孙大圣、东方红总部、长沙农联、高校风雷、省直联、红中会、长沙财联9家为“常委单位”，讨论了“成立公告”等文件和建立常设机构等问题。

10月6日，会议在东方红总部继续举行，会议决定10月11日上午8时在东风广场举行省无联成立大会，为此通过了“成立公告”、给毛主席的“致敬电”、“组织条例”等文件的定稿，各组织在“成立公告”上依次签字。会议制定的“大会程序”是：1、宣布大会开幕；2、宣读“成立公告”（由湘江风雷红艺兵战团负责）；3、工人代表（湘江风雷总部柳枚青）讲话；4、农民代表（长沙农联）讲话；5、学生代表（高校风雷周国辉）讲话；6、红旗军代表（贺孟宣）讲话；7、军队代表（341部队红色硬骨头）讲话；8、省革筹、47军代表（指名要黎原）讲话；9、由红艺兵代表大会宣读“致敬电”；10、呼口号；11、游行。要求发言时间短，战斗性强。

10月7日，一些组织在红旗军总部开会，主要议题一是落实“成立公告”的签名单位（因“公告”已排好版，只等成员单位名单开印），二是审查新申请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当即决定立即吸收红导弹、红电军、师院永卫东兵团，省无联正式成立后再吸收红造会、9.24黑鬼战团、三八兵团、长沙青年等，而省教联、职教联、东风近卫军则需进一步考察，三是又进行了一次分工：政治部由湘江风雷、省直联负责，组织部由东方红总部、红旗军、虎山行负责，宣传部由高校风雷、红中会、红专会、北区工联、矿冶井冈山红卫兵和井冈山公社负责，后勤部由财联、军区联总负责，联络部由省直联、红工会、红旗厂东方红战团、9中重上井冈山负责，保卫部由红旗军、孙大圣、青年近卫军负责，会议决定要做长沙工人、湖南井冈山的工作，争取其入伙。具体指定成立大会的组织工作由体委红旗的周桂芬负责，喇叭、广播器材等用品用具则由红工会、体委红旗、孙大圣、红电军、红专会、财联、气象红旗、军区联总分头解决。

经过数日不断的大小会议，“湖南省会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省无联”）旗号终于以提前透露的《成立公告》于10月7日打了出去。由于工联已“解散”，理所当然被排除在省无联之外，而对其下属组织，则看在其老造反派的份上，准予参加基层的联合。“以湘江风雷为核心的大联合”终于形

成了，此时又恰逢湘江风雷成立一周年（湘江风雷成立于1966年10月14日），盛大的庆典正在筹备之中，拟邀请全国的兄弟造反组织来长同欢，长沙所有影剧院向公众免费开放8天（惟不知道有何剧目可演）。湘派上下一片欢腾。

### 周恩来武汉接见与林彪 10.24 讲话

然而，就在省无联的小算盘珠子拨得咣咣响，筹划着即将开始的好日子的时候，传来了周恩来将在武汉召见湖南省革筹成员的消息。

10月10日，由东方红总部唐志明主持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主要是攻击周恩来的广州讲话，叫嚷“不管他”，并猜测“这次又要湖南代表去北京（按：实际是去武汉），可能是不同意我们的大联合”，抱怨准备去武汉的叶卫东、谢若冰“他们这样的人没有一点阶级感情”，无奈中决定将“成立大会”推迟至15日前举行。当晚，黎原传达了周恩来在武汉接见湖南代表的讲话，明确表示中央不同意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合”，并肯定了工联解散总部搞联合的方向，给了正在兴头上的省无联一瓢冷水。

10月11日，孙君森主持了在东方红总部召开的“常委扩大会”，会议攻击黎原的讲话是“排挤一方”，是“要用枪杆子压制造反派”；抱怨湘江风雷在关键时刻抛弃战友，表示不指望“戴着左派的帽子干革命”，要坚持将省无联搞下去。并以攻为守，决定将黎原的讲话和省无联筹备经过一并交群众讨论。

10月12日，由柳枚青主持，在东方红总部继续开会，会上除了自我打气之外，便是讨论省无联的出路。上策是要工联也来参加，但其要收回解散总部的声明；下策是灰溜溜地散伙；中策是冒被吃掉的危险干下去，最后决定取中策。至此，省无联正式宣告登台。

10月19日，省无联在东方红总部召开“常委扩大会”，会议有实质意义的是决定以宣传工作为重点，统一口径、大造舆论；为此准备创办一家报纸即《湘江评论》作为喉舌，但不以省无联，而以“湘江评论编辑部”的名义印刷发行。要“争取群众”，决心“以最大的代价，最大的牺牲”来换取“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

10月21日，红造会不听劝阻进入省革筹所在地省委大院，警卫部队开枪射杀两名邮电学校红造会成员。10月23日，柳枚青主持了在东方红总部召开的又

一次省无联“常委扩大会”，会上除例行公事的自我打气、发泄不满外，重点是讨论两名红造会学生送命可能造成的后果，决定以省无联的名义出殡，扩大影响，搅乱形势。红旗军黄正清说得最露骨：“我们要利用红造会死的两个人做点文章。”可此时的省无联正处于动荡与改组之中，已失去了支配大局的能力，两名红造会小将顺利下葬，省无联的文章未做成。

更令省无联意外的是，林彪于10月24日召见了47军军长、省革筹小组组长黎原，对湖南问题做出了重要指示。

如果说周恩来的武汉接见使省无联阵脚松动，并使齐卫东、夺军权等平添几分对周恩来的敌意，更使疑周情绪在省无联内进一步蔓延的话；林彪的“10.24”讲话却使省无联感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林彪说：湖南的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背后有三条黑线（国民党、刘陶、彭贺）；湖南还没有乱透。

林彪讲话传达后，工联针对“湖南的突出问题”，将早已发动的“批判极左思潮”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并成立了囊括几乎全部工派组织的“反极左联络网”；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学生中备受红中会等打压的小兄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8.19 造反有理军”，工联不惜撕下自己“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面纱，于10月27日组织了一支由二汽派至汽电厂培训的湖北佬为骨干，以刚从部队回来的梁甘林为司令的武斗队“8.19 主义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8.19 造反有理军）。

而日后被视为省无联黑参谋部、其实与省无联无任何关系的高校“革造总”（以文革初期被省委抛出的师院讲师羊春秋为首，全由被工作组揪出的“牛鬼蛇神”组成）则十分敏感地嗅出了气息，自此偃旗息鼓。仍由齐卫东掌权的一中红造会也紧跟林副统帅的指示，毫不心慈手软地镇压了本校“50多天”的受害者组成的教工“反迫害”组织。

但林彪的讲话又是模糊的。其忽略论据、舍弃论证、直奔论点的惯有作风留下大片空白地带，这无疑给省无联那批思辨色彩颇浓的知识分子留下了遐想空间。于是，张玉纲、周国辉等各逞才力，开始了对林彪讲话的自由解读。

10月30日，黎原在省体育馆正式传达林彪讲话，三天后，张玉纲就开始“正本清源”。他抛出《反逆流提纲》，称“林副统帅接见黎原标志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湖南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新的与全国不同的战略部署。这一

部署的核心就是湖南还要乱，还要充分暴露，必须彻底摧毁湖南的反革命三结合，这是一个新的转折点。”“由削尖脑袋钻进省革筹的黑线人物幕后策划，由《工联》、《9.17》（高校 9.17 红总——笔者）、《8.19》等组织的个别决策人台前指挥的‘反极左’围剿第一阶段战役已告段落。其锋芒已成强弩之末，造成了‘反极左’阵营内部的疲劳沮丧，暴露了他们的空虚和孤立无援。”“相反的，我们正在逐步恢复我们的主动，正在赢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并提出“反攻势在必行”。“对这次反击逆流以及今后湖南前途的展望是乐观的。越乱，矛盾暴露得越充分，解决才有可能越彻底。”

张玉纲对林彪讲话的别样解读，对处于彷徨中的省无联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或镇静剂。他突出了“乱”这个今日很难令人产生正面感受，当时却闪耀着“革命”的诱人光彩的字眼。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就是要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 7、8、9 三个月的天下大乱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如今湖南还“没有乱透”，自然未臻治境；批极左、大联合又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消于无形，形势自然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周国辉就声称：“湖南没有乱透，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就要冲击。要冲击就要有一个较大的社会组织，如果都回本单位本部门了，就无法冲了，所以要搞省无联。”如此，省无联的合法性就毋庸置疑了。而且，省无联的正义性也毋庸置疑。因为“联合的先决条件是（把黑三线）揪出来，而湖南没有揪出来，所以联不起来。”“有人说毛主席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是讲工人阶级内部而不是外部。”工联自“8.30”声明后即被斥为“工贼”、“老机”，自然属“外部”，岂有与其联合之理。

可是，如何理解“8.10”决定、省革筹的成立、特别是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一系列讲话等重树权威、恢复秩序的举措呢？杨曦光早有成辞。1967 年 7 月 6 日在他与北外的 516 成员杨新华讨论毛泽东为何不急于与周恩来摊牌及自己对此的对策时就将毛、周之间的“妥协”比作二战结束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妥协。他引用了毛泽东当时所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中的一段话：“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意在证明上层的妥协并不妨碍造反派在下层采取不妥协的激进立场。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出台后，杨曦光又对周一

之谈了自己的理解。他说：“7、8、9月份的全国性武斗给全国国民经济带来了很大损失，因此现在必须把革命的步调放慢下来，来一个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调整国民经济。任何革命都要求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在经济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强行发动革命，那么所得结果必然是得不偿失。因此，同经济恢复时期相适应，政治上应当有一个退却阶段，即对资产阶级采取让步政策。这就是毛主席暂时不同意揪周（恩来）的原因，这也就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内容。”“毛主席现在的战略部署是和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一致的”。

杨曦光这些六经注我兼瞎子摸象式的形势分析，当时博得我等蠢物鸡啄米般点头，其逻辑也被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省无联对林彪讲话的解读中。于是，在林彪讲话中湖南没有乱透是因为其突出问题是极左派的活动，而在极左派后面有三条黑线的因果链条，被省无联切成了分隔孤立可以随意砸人的三块大石头：没有乱透、极左派、黑三线。而首先挨砸的，当然是省革筹、工联。

署名一中夺军权的文章指出：“革命经过这么长一段轰轰烈烈的时期，经济也有所损。国内外敌人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我国国民经济的破产上，因此多方面都需要调整，革命需要基础，需要长期，一直往前冲是行不通的。拳头抽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因此，应该采取退却的方式，由革命的行动转为‘改良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省革筹上台了。一方面来讲，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生产可以正常开展，省革筹的成立对于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批准省革筹又是锻炼无产阶级革命派。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告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长时期的。”

如果说夺军权此文对省革筹尚犹抱琵琶半遮面，“狼子野心”尚未全部暴露的话，宋国亮（省直联络站）就没有那么客气了，省革筹在他眼里几乎与资产阶级司令部、资本主义复辟画上了等号。他在长勘院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8.10决定”时说：“当时大规模的武斗，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国内资产阶级的包围与国际上有联系。武斗、秩序较乱，所以根据当时国际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要求做出暂时妥协。《决定》发表和省革筹的成立是为了求得一段时间的稳定。这种妥协、退让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妥协、退让。省革筹的成立是妥协的产物，因此和旧省委同是资产阶级司令部。”“10.24讲话指出‘湖南是反革命三结合’，是指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乱透，是指省革筹中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化革命中实现复辟的就是省革筹，”“湖南还要大乱就是要夺省革筹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是从战略退却到战略反攻的部署。”至于这武斗与“国际上”联系的真相如何，为何“妥协、退让”才两个半月就要结束，宋先生就不管了，他眼里只有“没有乱透”。

《湘江评论》则认为前段“没有乱透”的形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搞“演习”，“目的是暴露敌人，教育群众。”“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根本一条就是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群众看清了敌人的面貌，群众懂得了斗争的实质就是‘决定性的胜利’。因此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群众的斗争水平。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应该‘演习’。同时，无产阶级革命派毕竟社会主义还只搞了一年多，还很不成熟，还没有出现真正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杰出代表。这就需要走资派继续‘表演’，在复杂的斗争中使无产阶级革命派更快地成熟。让省革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上台，不是说明他们是‘无产阶级性质的’，不是意味着斗争可以到此结束。而让反面教员来教育群众‘学习和准备同他进行严肃的战斗。（列宁）’”通过如此将革命当儿戏的“演习”而“更快地成熟”的“真正能够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杰出代表”是何方神圣？《湘江评论》自然不遑谦让。

周国辉的眼界则更宽阔，对全国形势也成竹在胸：“党、政、军内的老虎很顽固，‘7.20’事件就是典型例子。毛主席不好发动群众去与他们斗争，如果开展斗争，那么军内一小撮就会孤注一掷，就会搞垮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首先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发动群众，使群众遭受覆灭的危险。当时毛主席担心造反派不能经受起这次考验，因此他委托江青指出‘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启示了转折。但是有的人不懂得这个转折，就卖身投靠了。现在，中央又决定发动群众了。”周国辉还进一步强调说，“‘12.2’中央通知就是发动老造反派，解除了造反派的顾虑。这实际上相当于去年10月的中央军委紧急通知和3月的军委10条。”周老兄只图快活，说得口滑。他竟忘记了“12.2”通知要“正确对待”而非“发动”的“犯错误的老造反派”是与高司同类的浙江“红暴”、河南“造总”；而被省无联视为战友的贵州“411”、哈尔滨“炮轰派”、山东大学“主义兵”及辽大“8.31”、天津“大联筹”均和自己一样在困境中苦斗，丝毫感觉不到被解放的幸福。

当然，省无联也不是毫无目的地为乱而乱。矿冶井冈山公社就指出，之所以

“乱是好事”，是因为“只有乱，才能败露黑三线，才能揪出省革筹中的黑线人物；乱，能乱出鲜明的阶级阵线，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清洗那些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工贼和机会主义者。”

可是林彪不是明明白白地指明没有乱透是由于极左派的活动而后面有黑三线人物作怪吗？杨曦光不是早就以极左派自居并在日后与张玉纲等组织先锋队时准备以“极左派公社”或“极左派联盟”名之吗？齐卫东的唐亦安不是荣任“516”兵团的第八方面军负责人吗？黄杏英与张建旗的来往书信不是白纸黑字，尽人皆知吗？

周国辉站出来拨乱反正了。他说：“所谓极左派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右派，我们从来没右过”，当然不是极左派。反之，“正是他们（指工联）一贯的右，现在又跑到左边”，“过去右现在左的正是他们，这个极左派的帽子他们戴上正合适。”在周国辉看来，只要将极左派的帽子扣到工联头上，一切就好办了。

夺军权也改口了：“极左派就是右派，他们的政治思想就是修正主义思潮，联动思潮。”“极左派是老右派，他们偶尔利用革命口号来玩鬼，右和极左的阴谋都出自他们。并没有一种原来很左，后来太左了变成极左派的派别，世界上没有，历史上也没有。”

很难断定周国辉和夺军权说这些话时是出自真心还是假意，但很明显，经过如此一番搅和，左与右、极左与极右就糊糊涂涂成了一锅粥，似乎还真撇清了省无联与极左的关系。不仅如此，工联掀起的反极左，反倒成了针对革命派的反革命逆流，而且是全国性的逆流。

红中会六中“横空出世”宣称：“十月反极左就是地地道道的二月肃（湘江风雷）流毒运动的翻版，只不过招牌不同而已。十月反极左运动跟二月肃流毒运动一样，都是由二月镇反中的黑主帅提出的全国范围内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这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周恩来。

因为反极左是思想批判、舆论攻势，如杨曦光所云：“敌人吸取二月的教训，并没有大规模镇压，使人不感压力很大，但却用‘批极左思潮’把人的造反精神磨灭。”所以把反极左和二月肃流毒相提并论是最能唤起省无联乃至湘派群众的痛苦回忆、坚定其斗争意志的。周国辉就在这方面做足了文章。他说：“二月逆流是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十月逆流把坚定的左派打成反革命，

贩卖改良主义黑货；二月逆流是肃湘江风雷流毒，实质是肃湘江风雷和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十月逆流提出批极左，实质是肃我们造反派的彻底革命精神；二月逆流是打击一大片，现在是到处揪一小撮。”

不仅如此，在杨曦光、周国辉等看来批极左不但是局部复辟，而且是全国性复辟的前奏，因为批极左是与毛泽东提出的“要斗私，批修”分庭抗礼。

一中夺军权就说：“毛主席最近号召全国人民斗私批修。这个口号是非常革命的，是马列主义的。这个口号要求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要求在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斗掉私字，这就与刘少奇的说法严格区别开了。毛主席的这个口号是矛头向上对准走资派的，而二月镇反的黑后台提出的‘彻底批判极左思潮’这个反动口号呢，它不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是把一些革命群众运动的缺点错误，把一些曾被敌人利用过的革命口号打成极左思潮而加以‘彻底批判’，这就矛头向下对准了革命群众运动。”而周国辉则认为，“毛主席号召‘要斗私、批修’，这就是要批修正主义，然而现在就有人要‘斗私、批极左’，归根结底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指示。”

显然，在杨、周诸公的逻辑里，“修”即“右”、即资本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而“左”呢，按他们喜爱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是“无产阶级思潮的一个派别，沾染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观点。”如此一来，批修即批右，坚持批极左的省革筹、工联便被压在修正主义的五行山下动弹不得。而稍加阶级分析还可发现，那帮丑类之所以批极左如此卖力，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此疯狂，是因为他们就是明察秋毫的林副主席用照妖镜照出的黑三线。

周国辉指出：“既是反革命三结合，就必然有挂帅的，谁挂帅？就是刘、邓、陶。这就要在省委做文章。湖南国民党军官有三万，有的在拖板车，有的在卖烤红薯，把他们揪出来有什么用？揪出刘、邓、陶是主要的，在哪里揪呢？在省革筹。”“他们害怕群众到省委里揪黑三线，他们对刘、陶死党不闻不问，他们挑动永向东只搞牛鬼蛇神。湖南是三条黑线的结合，而且是刘、陶一线挂帅，我们首先要搞挂帅的人物。因此要搞刘、陶的黑线，这条黑线就在省委机关，在省直机关，在省人委机关。”“黑线人物都到省革筹去了。”

矛头向上即是大方向，红中会六中横空出世与周国辉颇有同感：“在反极左的破旗下结成了反革命的神圣同盟。他们为保护湖南的黑三线人物过关，以反极

左为名，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群众，在革命造反派中大反所谓极左思潮，大揪所谓坏头头。甚至对抗林副主席指示，跳动群众斗群众，在群众中揪什么黑三线人物。”

《湘江评论》、《长沙红卫兵》、《高校风雷》三家报纸也一拥而上，联合署名的长文指责省革筹“别有用心地强调黑三线中国国民党残余这一条黑线”，“实质是转移斗争大方向，保‘反革命三结合’，特别是保‘反革命三结合’的核心，无产阶级专政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湖南省委院内的刘、邓、陶死党。”

提到湖南省委，自然事涉国家机器，这就给了理论家们以马列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一中夺军权认为，湖南“正是一个烂透了的地方，对于它的斗争就是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不存在任何修补、改良。在这个烂东西没有完全铲除的烂摊子上成立的省革筹，正是一个改良主义的机构，一个承认了旧的国家机器的衣钵的机构”，“林副主席 10.24（指示）要我们砸烂旧摊子、揪出黑三线人物是有所指的，他极明确的告诉了我们：‘改良主义’已经由革命行动来代替，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

也许是嫌夺军权的文章书卷气太浓，矿冶井冈山公社直截了当地作出了结论：“林副统帅提出黑三线最重要的是刘、陶这条线，他们利用省革筹来起作用。”“省革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干的，而不是毛主席批的。”

北区工联的区街小厂工人对搞理论不在行，但在现实斗争中却心明眼亮：“黑线人物要开溜，所以千方百计指使一些人、蒙蔽一些人，在群众中去揪黑线，在当权显赫的范围以外去揪黑线，揪来揪去不能动省委大院里的老爷们，不能动三代走资派。我们说：揪黑线就是要到走资派的黑窝里去揪，就是要到省委大院里去揪。”

可是如何对待省委大院里章伯森、梁春阳等在反二月逆流斗争中支持造反派的干部呢？说他们是黑三线岂非授高司以口实而自打嘴巴？于是虎山行将其亮相视为潜伏：“章伯森之流实际上就是昔日黑省委的反革命干将，在文化革命以前，这帮家伙忠实执行刘、邓、陶黑指示，拼命诋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文化革命中章伯森之流是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刽子手，而且至今尚未交待他们与陶铸、张平化密谋镇压革命运动的黑内幕。在二月黑风中，章伯森之流也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角色。及至革命群众运动如暴风骤雨再

次兴起，章伯森之流遵照张平化密信中‘湖南大权不能交出’的反革命部署，有计划带着一批厅局长以亮相为名钻进了革命队伍，致使被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国家机器暂时躲过了革命风暴的摧毁。在革命队伍中安下了极其危险的定时炸弹。”如此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章、梁不论亮相支持造反派与否，均逃不脱黑三线的帽子。

眼见靠如此单薄的推论和流言蜚语给人定罪难以服众，周国辉便祭起了文革中各家各派均无师自通、不学而能的法宝——疑罪从有：先将你打入另册，还愁搞不出罪证？所以“讲轰章、梁要材料，我看不对，只有群众起来以后，才有材料。现在几个人搞调查是不行的。”所以要打“人民战争”，具体来说就是要搞省无联。

至于周国辉这些革命辞藻充溢、马列主义高扬的大报告后面有何盘算，与周同属高校风雷的郑义思看得颇为清楚，她在给红斗的一封信中就认为，“周国辉对问题的看法一直是神秘莫测”，但“照我的理解，省革筹小组是不是有黑三线人物对他来说是无关紧要；省革筹也绝不是揪出一二个人，纯洁省革筹的问题；而是应该全是我们这样（的人）来夺权。”其实这底牌也算不得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权则有一切，无权一切全无；这既是副统帅的教导，也是现实斗争的教训。在这点上，工联无联，彼此彼此。

### 组建舆论宣传的“先锋队”

对“10.24”讲话的解读使舆论宣传工作在省无联内部的地位愈显重要，一批“理论家”和“宣传家”开始在张玉纲、杨曦光周围聚集，而这也是张的针对省无联组织方面的弱点采取的重要部署。

张早在《组织革命的先锋队》就指出：“省无联的重整旗鼓肯定将对革命斗争起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省无联其组织形式的特点，规定了它对形势的变化不可能有迅速的反应。由于参加省无联的组织带有不同的色彩，因此它也不可能有明确的纲领。”所以必须组织一支先锋队式的队伍，而先锋队应该“由立志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青年（工人、学生和知识青年）组成”，但“这些人仍然保持与原组织的联系。”

他在《反逆流提纲》又提出：“建立统一、坚强的指挥机构，应该高度重视

机关报作为组织者和指挥者的作用（决不是单纯的所谓宣传）。联合机关报应由各主要组织派出主要决策人予以加强，以确定主攻方向，推进进度……”显然，这是在克隆列宁的《怎么办？》中以机关报为核心组织先锋队的既有模式，而于10月19日决定成立的《湘江评论》的地位则相当于《火星报》。

工联在日后的批判中揭露：“张玉纲、周国辉、杨曦光为了在省无联内建立一个所谓的‘革命先锋队’，于是在内部造了不少舆论。张玉纲在其黑后台的策划下，炮制了这株大毒草（即《组织革命的先锋队》），同时在幕后进行了一系列个别串联工作。后来因为这个所谓先锋队的对象大部分都是红中会的，周国辉、杨曦光、张玉纲等人便把红中会的申学崧等负责人找到公安厅招待所四楼，召集省无联与先锋队的发展对象一起开会。会上周、杨、张一致说，‘这样做（指建立先锋队）不是拆红中会的台，相反是加强红中会的战斗力。’在这个基础上，张、周、杨等便在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红中会和知识青年中找了一批他们认为‘极可靠’的人，成立了所谓‘极左派联络站’。”

周一之的几段话则证明工联的揭发并非全是对立面的无端攻击：“省无联10月11日成立以来，由于省革筹对省无联几点意见的公布，省无联便名存实亡了。省无联既没有一个工作的地方又没有人具体负责领导。这时张玉纲、周国辉等人便趁机而入，拉拢一批红中会战士在红旗军总部四楼挂起了省无联的招牌。有人提出要成立一个战斗组织，名称定为极左派联盟，后改为极左派公社。”“张、周、杨等另外从红中会、红专会、体委红旗选了一批人到省无联工作，把省无联各部都充实起来，并把《湘江评论》也从省人委迁到省无联。在这一段时间里省无联工作人员都由张玉纲领导开会学习，杨曦光也常来交谈。”

不管叫联盟、公社，还是叫联络站，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先锋队”总归是成立了，骨干自然来自张、周、杨十分重视的红中会，如三中马里佩、四中陈琳琅、九中李竹双。他们白天下厂串连发动群众，晚上关起门来跟着张玉纲苦读马列，进行理论建设。周一之主持的《湘江评论》则成了省无联的“机关报”，他撰写的发刊辞力追五四时期的毛泽东：“洞庭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大气磅礴，力扫千军。

“先锋队”的工作可谓战果辉煌，仅以其可将一个对自己十分不利的 10.24

讲话改造成克敌制胜的法宝，并使不少人信服，便可让人对中国的一句老话——“人言可畏”作出新的理解。相对于“先锋队”的生龙活虎，“主力军”可谓乏善可陈。除了东方红总部和红旗军两张老面孔之外，省无联的常委三日一选、五日一换，似有似无；而其日常工作则限于开一些或议而不决，或决而不行，或扯皮吵架的会议。其间有过再封《湖南日报》的动议，但无能力或无勇气付诸实行；其间也针对气焰嚣张的主义兵成立了据说准备以暴易暴的“长沙青工”，但除了稀稀落落几张字体不正的标语外，司令为谁，成员几何，无人知晓。群众大会倒是开过几次，但偌大的劳动广场上的寥寥千人数千人，实难激动人心。倒是先锋队与主力军一身二任的周国辉四出作报告，为革命群众分析形势、释疑解惑、指点迷津，事前还张贴海报预作宣传，颇似今日之明星演出前的招徕观众，很能耸动视听。然而，若无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的救驾，省无联自上而下“按行业按系统实现大联合”的路线图必入短路。

1968年11月中旬，湘江风雷湘药战团、矿机战团、工业系统总勤务站，红旗军湘药支队，红旗厂东方红战团在二中与红中会“旭日东升”等组织共商如何进一步动员工人力量加入省无联，此可视为筹组省无联“工总”的首次尝试。

11月18日，湘江风雷湘药战团、红艺兵战团、卷巨澜战团，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在湘药厂集会，再次提出组织工人队伍；12月16日，红旗军卫总、东方红总部卫总、卫联“造反到底”、湘江风雷红卫战团、红导弹卫勤站联合成立省无联卫总；

1968年元月13、14日，部分省无联“常委”与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在长勘院和省航运局连续就成立省无联“工总”召开会议并达成协议。16日，“工总”正式挂牌——此时距省无联垮台还有八天。在代成立公告的《严重声明》上签名或“代签名”的有56家单位，包括从中央、省属企业到街道小集体厂。其中虽然有长机、红旗、供电局等赫然在列，但除红旗厂东方红战团在本单位稍有影响外，其他都是湘江风雷、东方红总部、红旗军、青年近卫军、长沙工人、孙大圣等的小小基层战斗队，且多已与其总部难以在政治上保持一致，无足轻重。况且56这个数字，与长沙地区的企业总数相比，肯定也是小之又小。令人费解的是，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虽然号称为省无联工总的发起单位，但其属下有实力的缚苍龙、卷巨澜、红旗甚至对工总事务最热心的湘药等战团均未在《严重声明》上签

字。而工总的常委中也不见毕健（红旗军）、李万翠（红工会）、柳枚青（湘江风雷缚苍龙）、李慈顺（湘江风雷卷巨澜）等大佬级人物，反倒充斥着邹德云（有机化工厂红旗军）、周湘陵（卷尺厂“专保革命小将对外作战部”）、汤清明（床单厂湘江风雷）、彭明高（新兴翻砂厂湘江风雷）等无名之辈。

### 尴尬的湘派在内斗中自戕

省无联的活动与一年前的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半年前的反二月逆流之波澜壮阔相比堪称冷清，但毕竟是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湘派则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最先开溜的是长沙工人。长沙工人本是组织省无联的始作俑者，9月28日，就是由长沙工人组织部代章，湘江风雷、长沙工人、东方红总部、孙大圣、青年近卫军、红旗军等发出“重要会议通知”，正式开始筹组省无联的；可到10月2日，长沙工人以政治部名义发出一个便条，决定退出省无联“筹备组”，但直到10月4日，吴超仁仍以长沙工人名义参加省无联有关会议；10月5日，长沙工人发表“关于促进我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重要声明”，宣布不承认“9.30声明”，自此不参加省无联的活动，完成了与省无联的切割。

10月12日，长沙农联发表“火急声明”，不承认参加省无联；

10月25日，孙大圣发表“对当前重大问题的五点声明”，表示不参加工、湘任何一派的单方面联合，显露出对无休无止的派性斗争的厌倦情绪；

湖南井冈山本是湘派的一彪劲旅，也参加过筹组省无联的会议，但组织上却与其并无牵连，本可置身事外；但眼见工联坐大，“8.19”造反有理军得意，又于心不甘，于是在11月23日莫名其妙地发起了炮轰章伯森的战役。此举显然很难与省无联立场划清界限——但省无联对此却并不领情，张玉纲在《我们的纲领》中就将其视为机会主义，认为“此路不通”——井冈山对此亦心知肚明，因此在“1.24”接见时康生在对《我们的纲领》逐字逐句批判念到“谢氏揪章运动证明此路不通”时，神经高度紧张的李亚雄（井冈山二把手）误以为井冈山被点名，吓得几乎跌倒。

但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视作省无联的“核心”的湘江风雷的态度。

10月1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表“关于‘9.30声明’的自我批评”；

10月17日，罗新发在东风广场的“以斗私批修为纲，粉碎极左思潮的猖狂进攻大会”上代表湘江风雷总部再次作自我批评；至此，湘江风雷在政治上与省无联划清了界限，重返《8.10决定》搭建的主流文革舞台。

果然，11月9日，工联、湘江风雷、长沙工人、青年近卫军发表《关于促进迅速实现按系统大联合的联合公告》，排除了省无联的干扰，从形式上开始了工、湘两派大联合的进程。

然而，就在这一派莺歌燕舞之中，不和谐的杂音时时泛起：

10月19日夜，湘江风雷总部与工联发生分歧，退出次日的批斗蔡爱卿大会；

11月4日，湘江风雷政治部召集高校风雷、矿冶井冈山公社、省直联、湖南井冈山开形势座谈会，省无联的身影仍在湘派群中闪现。显然，根深蒂固的派性不是一纸《联合公告》所能解决的，双方都在寻找对手营垒的缺口，以期在“大联合”真正实现之前扩大自己的阵地。于是，湘派各家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了主义兵。

11月26日，高校风雷发表“取缔主义兵”的《声明》；

11月28日，青年近卫军总部发言人称：“抗议‘8.19’主义兵挑起11.23武斗，要求惩办凶手，取缔主义兵”；

12月3日，青年近卫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出“紧急呼吁书”，号召与主义兵作坚决斗争；

12月初，青年近卫军、孙大圣、长沙工人均刷出大标语，扬言“打倒主义兵”、“打倒梁甘林”；

12月12日，湘江风雷、湖南井冈山、青年近卫军、东方红总部、红中会、红专会、长沙工人、孙大圣、红工会、红旗军、红造会“揪黑三线人物总指挥部”发表“关于坚决取缔非法武斗组织‘8.19’主义兵问题联合声明”。

与主义兵的对抗，是“10.24讲话”后湘派唯一的一次联手出击，同仇敌忾，动静颇大；然而干打雷不下雨，背靠工联的主义兵我行我素，岿然不动。倒是湘江风雷内部在敌、我、友界限的交错变动中，闹出了大乱子。

众所周知，早在“2.4批示”之前，湘江风雷总部就有叶（卫东）派、张（家政）派之分，据说前者温和，后者激进，但深层原因估计还是权力斗争。司马里会议之后，“6.6惨案”引起的紧张气氛将日渐凸显的工、湘矛盾暂时掩盖起来，

但6月15日一个名为“湘江风雷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在《给湖南革命造反派和湘江风雷广大战士的一封信》中却说：“工联是湖南各革命造反派所公认的左派组织，我们应该诚恳地支持与维护工联的一切革命行动，坚持革命造反派巩固地大团结。而总部的某些人在外力的支配下口头和行动极不统一，6月4日临时会议所召开的总攻击会有对抗工联所安排的支持革命干部亮相大会的迹象，这种强求革命的整体利益服从宗派主义利益的错误倾向，潜伏了将来革命造反派分裂的危机……”这不但首次将工、湘矛盾向社会公开，而且将尚在狱中的叶、张矛盾重新挑起。而随着北京谈判开始和中央7月27日表态为湘江风雷平反，其总部常委陆续出狱，叶、张之间果然旧账未清，新账又起。

9月下旬起，柳枚青（长纺“缚苍龙”）、李仲昆与其属下湘药战团刘忠发、红艺兵战团韩军等开始多方串联，张派湘江风雷在组织上开始成型；

11月初，湘药、红艺兵串联卷巨澜、金猴、猎潜艇等战团在红色剧院开会，统一张派思想，正式密谋倒叶；

11月18日，周国辉、柳枚青、唐志明、刘忠发等商议将湘江风雷全部拉出来搞省无联。柳再次指示刘忠发进一步串联，准备夺总部大权；

当晚，韩军召集张派会议，柳枚青到会再次动员接管总部，并说自己将去北京“到中央为省无联备案”。

与此同时，李仲昆密示何建国与红艺兵、金猴等几个大战团串联起来，组织起来，杀出湘江风雷，搞垮叶氏总部；

但“叶氏总部”岂甘束手待毙？

10月13日，湘江风雷“自己解放自己”战斗队发表《请湘江风雷的战友们思考10个为什么？》，剑指张家政；

14日，湘江风雷“专揪坏头头”、“反迫害”战斗队发表《提出20个问题》，矛头亦直指张家政；

10月25日，湘江风雷“观察小组”“问张家政之流8个为什么”；

10月27日，湘江风雷工业系统总勤务站7.27支队发表《这是为什么》，挺张攻叶；

同日，“揪黑手战团”《向湘江风雷战士提出十大问题，请大家找答案。》矛头仍指向张家政；

11月5日，“专揪坏头头”“反迫害”再提《40个为什么？》，还是攻张家政；

11月10日，“专揪坏头头”“反迫害”、“观察小组”就张家政扬言要“干掉他几个”发出《最最紧急呼吁》；

11月12日，湘江风雷作为叶氏喉舌的《专揪坏头头战报》出版；

11月24日，湘江风雷总部发出《郑重声明》，不承认省无联并坚决支持“专揪坏头头战斗队”等的革命行动，湘江风雷内部分裂公开化；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任何妥协或转圜的可能都已消失，摊牌已不可免。

12月3日，湘药、金猴、区街工总、卷巨澜等在东方红总部密谋，决定以形势座谈会的形式进一步串联，向叶氏总部夺权；

12月9日，红旗、湘药、金猴、卷巨澜等在红旗战团开会，水电司令部蒋俊隆主持，正式策划接管总部；

12月13日下午，省无联在二轻局金猴战团召开形势座谈会，刘忠发发言称“我们要组织力量把湘江风雷这面旗抗下去”；

12月14日，座谈会继续，统一张派思想，接管总部，再封《湖南日报》；

12月17日，再次在金猴战团开会，湘药、卷巨澜、风雷激等共同研究起草“对叶氏总部的声明”，又有人提出封《湖南日报》；

12月20日，“揪叛徒战斗队”发表“10个为什么？”攻叶；

当日下午，在金猴战团开座谈会，金猴、湘药、卷巨澜、红旗参加，继续策划倒叶；

12月23日，在卷巨澜开会，湘药、金猴、红中联等20余人参加，决定由红中联出面，湘药出人，次日封总部；

12月24日上午，湘江风雷总部被红中联等战团封闭，下午在金猴战团所在地二轻局开会，决定接管事宜，当晚，接管单位开会，成立“接管委员会”；

25日，金猴、湘药、缚苍龙、铁勤站、红中联、刺刀见红、区街等组织宣布成立“湘江风雷临时接管委员会”，同日上午在劳动广场召开所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革命路线，彻底摧毁湖南反革命三结合誓师大会》，赵南西（卷巨澜战团）代表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宣读了《告湘江风雷全体战士书》，声称：“叶氏总部以反极左为名，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借‘揪坏头头为名’，执行了没有

‘二四’批示的‘二四’批示”，并宣布接管湘江风雷总司令部的一切权力。

对“叶氏总部”被封、“接管委员会”成立，最高兴的自然省无联——虽然如前所述，接管委员会十分奇怪地从未宣布加入省无联；而且其行动与口号与省无联也并非完全一致，如1月7日在省无联于劳动广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梁春桃代表湘江风雷“接管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反对炮轰周总理”、“服从省革筹、47军的正确领导”时台下响起了“打倒折中主义”的口号声。

湘派由此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他们不但不能步调一致采取行动，甚至已无法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了。利益的分化迫使湘派组织各奔前程，其在“1.24”后的结局也大相径庭——

长沙工人为自己的首鼠两端，湖南井冈山为自己的鲁莽盲动付出了代价：身为省革筹成员的张楚鞭、谢若冰丢掉了本可到手的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席位；

青年近卫军虽然对省无联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自周恩来武汉接见后却也再不以总部的名义参加其活动；直到12月27、28日总部发生“政变”，成立“军管会”，31日，“军管会”开除被认为是亲工联的总部宣传部长朱国良，海司令才发现自己的山头与省无联并未撇清干系。然而，一贯大大咧咧的他仍旧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所以“1.24”之后他必须为自己的粗枝大叶买单：因为接见中江青毫不客气地请青年近卫军“到苏联去”。在此形势下，青年近卫军只得自找台阶下，唱着高调退场：“苏联不去，山头不保，紧跟毛主席干革命！”虽说死得不算太难看，但在“大联合”、“三结合”中只能充当叨陪末座的小伙计了。

堪称异数的是孙大圣和矿冶学院井冈山兵团（由高校风雷的发起人之一陈勇领衔），他们打着非工非湘的大联合派旗帜不偏不倚地走过了独木桥，双双进入省革命委员会充任常委；特别是后者，挤掉的居然是高校风雷的死对头、工派大专司令部的朱顺祥，令人称奇。

由于省无联和接管委员会的“帮忙”，从表面上看，“1.24”后的叶卫东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舞台上的，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他甚至还有点扬眉吐气（相对于再次入狱的张家政、李仲昆而言）。但是随着接管委员会被当成省无联镇压，湘江风雷本不巍峨的山头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塌方：李仲昆的湘药战团全军覆没，缚苍龙的柳枚青、梁春桃，卷巨澜的李慈顺所部被革出教门。叶卫东已没有多少可炫耀的资本了，跟着他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只有李敬林、李

铁凡（港航），王天保（长纺）、袁平泰（省药材公司）、袁建国（水泵厂）、廖立（供电局）、杜志明（五金工具总厂）、刘海霞（市饮食公司）等寥寥数人，与工联胡勇与其汽车电器厂造反有理总队的小兄弟各据要津、如日中天的“汽电政府”实难同日而语。

---

## 【小资料】

### 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名单

( 1968 年 3 月 6 日成立 )

主任——

王淮湘，48岁，山东寿光人，十六军政委，中农出身

副主任——

阮泊生，52岁，河北蔚县人，原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手工业者出身

郑季翘，56岁，山西五台人，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地主出身

萧道生，51岁，湖南茶陵人，空一军政委，贫农出身

何友发，49岁，陕西泾阳人，吉林省军区司令员，贫农出身

常委——

苏俊禄，51岁，河北晋县人，吉林省军区副政委，地主出身

蒋克诚，51岁，四川阆中人，吉林省军区副司令员，贫农出身

王振华，52岁，河北任丘人，吉林省军区副政委，破落地主出身

徐仲禹，48岁，江苏徐州人，十六军副军长，地主出身

蓝干亭，50岁，山东招远人，原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地主出身

周光，57岁，安徽金寨人，原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副省长，贫农出身

张士英，52岁，山西晋城人，原中共吉林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中农出身

邹明友，31岁，山东福山人，吉林省客车厂工人，贫农出身

吴招弟，37岁，浙江瑞安人，636厂工人，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耿志才，30岁，吉林长春人，汽车厂工人，工人出身

边仲科，29岁，河北枣强人，洗染厂工人，下中农出身，共青团员

徐飏，30岁，辽宁沈阳人，汽车厂技术员，工人出身，中共党员

李树，34岁，黑龙江双城人，国营机械厂工人，雇农出身

陈贵，49岁，吉林长春人，城西公社党支部副书记，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赵桂兰，女，18岁，吉林长春人，大屯公社妇女队长，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朱文贵，38岁，辽宁绥中人，城西公社生产队长，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张振标，24岁，河北深县人，吉林工业大学学生，吉林工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常委（长东二社派），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邬孟庄，25岁，浙江镇海人，长春地质学院学生，长春公社地质学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常委（长东二社派），职员出身，共青团员

王维宾，28岁，辽宁北镇人，吉林师范大学学生，东方红公社毛泽东思想教育大学（即吉林师范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常委（“长东二社”派），雇农出身，中共党员

孙凤歧，25岁，山东海洋人，东北人民大学学生，二总部东北人民大学红色造反大军常委（红二派），贫农出身，共青团员

尹嘉英，25岁，辽宁辽阳人，吉林农业大学学生，吉林农业大学革命造反大军常委（红二派），工人出身，共青团员

姚美玲，女，23岁，江苏南京人，吉林师范大学学生，二总部吉林师范大学革命造反大军常委（红二派），革命干部出身，中共预备党员

许肇昌，32岁，吉林榆树人，吉林日报社记者，红色造反者吉林省革命委员会（红革会）执行常委（红二派），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都淑珍，女，36岁，吉林永吉人，吉林省交际处管理员，贫农出身，中共党员

吉林两大派为：第二红卫兵总部（二总部）与红革会观点一致，称为“红二派”；长春公社与东方红公社观点基本一致，称为“长东二社”。群众组织代表中有人属于哪一派不详，尚待知情人补充。

---

## 【简讯】

### [高龄老人的自印书《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余 樵](#)

现年九十四岁的张宣三老人，最近将他积多年研究心血写成的七篇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集为《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书，由李锐作序，自印分送亲友。

张老 1916 年生，1938 年加入中共，1953 年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调国家计委。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经济所副所长，1986 年离休。他曾经是一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后来却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感到理想的破灭，最后在文革中自己也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因此他“更加要读马、列、毛的著作，希望从他们那里找到答案，慢慢地从崇拜到怀疑，到后来慢慢感觉到问题出在他们身上，人民的苦难不是别人带来的，而是从他们那里产生的”。

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从他的人道主义激情出发，通过一系列思辨的方式所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他的无产阶级革命观，都脱离了欧洲社会实际的发展，他所要建立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成为空想。他是当时欧洲出现的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中理论最完备的、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作者还指出：从“以人为前提转向以物质生产力为前提是马克思历史理论错误的开端”。

作者在书中还详细叙述了由于社会现实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理论陷入困境，恩格斯在晚年不得不承认欧洲工人阶级越来越获得平等的普选权利等现实，但又不能不为捍卫他和马克思共同创立的理论进行斗争。直到恩格斯去世后，他的继承人伯恩斯坦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全面和彻底的修正，为把社会民主党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条件。

作者还分别论述了马克思怎样陷入黑格尔和巴贝夫、布朗基的阶级斗争的绝对主义的陷阱，列宁怎样对马克思主义从捍卫到修正，毛泽东又如何严格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导农民革命和实行统治。指出：“从列宁到毛泽东，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在农业社会的一场革命实践，说明马克思主义所能实现的只能是使落后的农业社会更深地陷入落后，推迟了这些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变。”

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尽管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却写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有很好的可读性。

## 【编读往来】

编者说明：

本刊 47 期（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问世之后，收到了 42 封读者来信。因篇幅所限，不能将来信一一发表，谨选其有代表性者，依来信时间，编排如下。

### ● [孙传钊来信（2010-4-28）](#)

这位女校长被打死，从人道、人性一面值得同情、应该追究悲剧原因和刑事责任。但是此人从事的“教育工作”正是毁灭自身和其他千万无辜牺牲者的宏大事业的一部分，而且平反工作还由置她于死地的体制来实施，这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管怎么说，她作为党员干部，与我爸妈、我的同胞这些小人物相比，已经不是小人物了。她的死，是暴力集团内部斗争的结果。

### ● [郭建来信（2010-4-30）](#)

我觉得，这期的文字，多有为红卫兵（尤其是某些红卫兵个人）文饰之处，它的另一个效果（这一点更为重要）是把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与结论淹没在一些经过作者精心选择、同时又似是而非的细节之中。我们当然应该探究那些主义兵、红旗、红卫兵之类的组织是由何人发起，在何时何地成立的，但是如果论者一方面说，学校没有出现全校性的红卫兵组织，是红五类，就自认是红卫兵，另一方面又要千方百计地“证明”卞校长并非死于红卫兵之手。这种说法，就重大的历史判断来说，就红八月中红卫兵所作所为所应得的公判来说，意义何在呢？再说，昨天在领袖身边热泪盈眶，明天就开始撒身当逍遥派，这个故事对于我们经历过红八月的人来说，自然是天方夜谭（不仅是个人故事的不真实，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根本的意义上脱离了历史的真实），但对于没有这种记忆和感觉的后代来说，就未必如此，你说对吗？

因此,我想,为了平衡两边的说法,更为给读者提供思考判断的基础和机会,《记忆》是否可以在下一期刊登王友琴和王容芬的文章,如果叶维丽愿意,把她那篇匿名发表的文章也放上,以便各方面的观点都有机会发表。恕我直言。

● [编者回复郭建\(2010-5-5\):](#)

47期原来编排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此文出自王友琴著名的《文革受难者》一书。在出刊之前,我们曾联系王友琴,就《记忆》选登此文一事征求她的意见。但她不同意我们摘录,并提出要发只能发全文。但是因为那些篇幅较长的、已经在许多媒体及书籍上发表过的广为人知的旧文,我们无法全文照发,因此只好作罢。

鉴于王友琴的上述态度,《记忆》不宜按原计划编排。因此,呈现在各位面前的47期就没有了王友琴的相关文章。对此,我们深感遗憾。

说到这里,我们要请你做一个工作: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们希望在《记忆》上刊登王友琴的哪篇文章,请你首先征求王友琴的意见,请她给我们发来她同意发表的文章的电子版及授权书。

关于来信提出的“出师大女附中专辑之二”的问题,兹复如下:

在出47期之前,我们就准备出“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二)”。这将是一个增刊,即在半月刊之外加上一期。因为我们不能连续出专辑,那样非专辑性的稿件就要大量积压。对于这期增刊的稿件,我们有两个方案,一是刊登你和其他朋友建议刊发的那些文章。但是从刊物角度考虑,如仅仅重发王友琴文(如她同意)、王容芬文、冯敬兰文、白芳文,这一期就成了文摘。而对于读者来说,这些文字或因为熟悉而缺乏新鲜感,或因为缺乏针对性而不明就里。同时因文章太长会大大超出本刊的篇幅,也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因此,我们主张,在发这些文章的时

候,《记忆》和作者都做些工作,《记忆》的编者要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发这些文章。作者则要说明:1)该文的主要观点是什么?2)对立面对此文的指摘是什么?3)辩解与回应。

另一个方案是,请王友琴、你和其他几位有较大反对意见的朋友撰文,答复叶维丽和冯敬兰等的五人谈提出的相关史实和看法,全面阐述你们的观点,请重点回应叶维丽提出的“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的问题。如果能借此机会将讨论上升到历史研究方法的层面,那么对读者、对文革研究都将是大有补益的。以上两个方案,我们打算选择后者。

君以为如何?

- [蒋健来信\(2010-5-4\)](#)

《记忆》47期对文革初发生在师大女附中学生中的两个标志性事件进行探究确实很有意义,这不仅关涉史实和当事人的名誉,也涉及到文革历史的研究方法。我们在谴责文革的同时,应当尽量注意避免用文革那套思维方式来对待文革中发生的事情,研究历史不能“宜粗不宜细”,毕竟细节决定真实。

事实上,目前官方文革史的状况不只是“后面发生的事情倒过来影响了前面发生的事情”那么简单,恐怕更多的是为了避免深究下去会出现“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尴尬。

具体到本期中的内容,一些受害者不愿意“记忆”或叙述当年受害的情节也绝非“宽容”那么简单,毕竟被自己教育并热爱的学生殴打是件难堪的事情,何况这还关涉到文革前教育制度的优劣。

当事人宋彬彬为自己辩诬完全是正当合理的,特别是她还交代了她受王任重“委托”去武汉的内幕。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不仅是毛泽东、江青这些文革的

发动者操纵学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且其他高级党政官员也有类似的行为。

不过，我认为宋彬彬看到被冒名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那篇文章非常生气”是表面现象，因为从宋的叙述看，这篇文章当时还是给她带来很大好处的，不然她也不会接受王任重的“委托”去武汉的，何况没有那篇文章，王任重肯定不会“委托”她的，想必宋彬彬当时就明白这一点吧？！

另外，宋彬彬说她后来“一直想找到那个记者，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其实大可不必，这位记者恐怕也只是个同“宋要武”一样的道具而已，真正该探究的是谁批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该文？又是谁批准在《人民日报》上转载该文？是穆欣、王任重甚或陶铸这个层次的人吗？“要武”是不是“伟大领袖”当时的一个战略部署呢？

最后一点，诚如宋彬彬所言“我不经商不从政，不想出名不想升迁”，她确实生活得相当低调，按说她父亲在文革后相继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等职，她在这方面有的是资源可用，如果她想利用的话。但她的夫君靳剑生却并不低调，而且个人的事业相当成功，这就令人难免联想到“太子党”这个话题……而传说或神话常常是“社会情绪”的表达，所以本期《记忆》虽然对“卞案”及“宋文”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但“宋要武传说”恐怕还得在社会上继续流传下去。

#### ● [印红标来信（2010-5-5）](#)

从历史学者的角度，我赞同对关于师大女附中打死卞校长一案的基本事实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恰如其分的评论。我以前读过王友琴写的文章，但是认为原老红卫兵们的诉说也应当重视。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宋彬彬确

实没有参加打死卞校长的行动，那就不应在字里行间把她当成此案的参与者。批判文革暴力的靶子要找准，才有说服力。

另外，我始终对 8 月 5 日事件发生那天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这个组织是否还没有成立的说法有怀疑，认为需要进一步考订。但是，如果确实没有成立，就不能说这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暴行。如果参加暴行的人后来参加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那就要如实说这些人是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的成员。不论是群众自发的暴行，还是红卫兵成员的暴行都应当谴责。同时，在叙事的时候应当尽量准确，不必让红卫兵为所有的暴行负责，例如令人发指的北京大兴县农村的灭门暴行，就不是学校红卫兵所为。后来军宣队(军代表)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整人致死的案例，也不是(或者主要不是)造反派组织所为。

我认为，历史学的责任就是尽可能把事实搞清楚。当局主张“宜粗不宜细”，应当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致使很多事实模糊，结论笼统乃至背离事实。对于师大女附中这件事既然有人愿意把史实说清楚，那是好事。

我始终认为应当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摈弃“把一切罪责记到林彪、江青账上”的作法。也不要简单地把一切暴行都记到红卫兵、造反派身上。事实是多面的，认识也要避免简单化。我的想法可能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但是我觉得至少历史学要有点考证的精神。政治和道德批判，无疑是重要的，但是代替不了史实的考订。

师大女附中校方在校庆纪念时挂出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一事，应当坚决地批评。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表现应当实事求是，把历史事实说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叶维丽等人的意见有价值。而师大女附中现任领导对文革的态度才是应当炮轰的，简直是是非不分，误人子弟，冲这一条就不配当中学领

导，表明多年回避文革问题造成了怎样的恶劣后果。

王容芬的文章和冯敬兰主持的访谈都提到林莽老师回忆宋彬彬在 1966 年夏天提审他的情景。这段回忆在细节上确有疑点，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否还健在，最好请他再回想一下。疑点之一是师大女附中在 1966 年没有男生（除非有外校男生来助阵），而后来开始兼收男生时，老红卫兵已经没有权力审问林莽了。疑点之二是林莽老师所说在场的另一位被审的历史老师称没有与林莽一起被提审过。倒是那位历史老师的说法更合乎情理：事情发生在 1968 年下半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那时已经有男生入学，但是主审人就不可能是宋彬彬。旧事重提，如果只是一般地讲讲故事，马虎一点也无关宏旨，如果作为对宋彬彬的罪行指控，就需要认真核实，排除疑点了。回忆录中常见事实描述的失真，记得在历史系学习时，老师就曾提醒学生阅读革命回忆录时要留意，至今印象深刻。这是引用任何回忆录都要注意的。

有些在国外的朋友，大概是看惯了西方传媒对纳粹的那种一面倒的、不必证实且没有申辩可能的谴责，觉得只有像那样谴责红卫兵才算作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正确。我认为：谴责包括红卫兵在内的群众暴行，要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要有证据，有红卫兵经历的公民也有申辩和澄清历史事实的权利。史实考订不可因为道义而被忽略，就像我谴责南京大屠杀，但是仍然认为对于受害者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应当是一个学术上可以讨论的问题。另一个例子是抗战中中国人的死亡数字。在很长时间内，历史教科书曾说是 2000 万，1995 年江泽民在莫斯科说是 3000 万，此数据未见历史学界的充分论证，但是此后就统一按照这个数字讲了。这种由政治和政治家代替历史研究的事情是不正常的。

史实准确才真正有力量。

● [刘双来信 \(2010-5-6\)](#)

现将我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1) 历史上先后为卞开过两个追悼会。第一个是 69 年还是 70 年，悼词说，被刘邓路线迫害致死。有两个迫害致死，哪个更接近事实？

2) 从来就没有什么“权力真空”，818 之前，权力掌握在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手中，否则，818 为什么不是于铃和冯敬兰上天安门？“老兵”退出历史舞台是 13 期社论以后的事情。

3) 《记忆》不宜变成“辩论”舞台。因为国情，做不到言者无罪。建议《记忆》能够刊登王晶垚 07 年的声明。

4) 所以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不同人提供的“史料”是需要比较的。而将“不同”的史料呈现出来，才可以比较。而“比较”的过程则更加艰巨和困难，因为做“比较”时，人的主观意识又要起作用了。

5) 附件是冯敬兰早期的《记忆的疮疤》( 96 年 )，希望下期《记忆》能刊出。

6) 《谈话》中说 8 月 1 日军训回校见到谭力夫讲话的大字报。老谭的讲话是 818 以后的事情。我记得是 8 月 20 日。在北京的传播应该在 8 月底左右。回忆历史和编造历史是有区别的。还是傅斯年的那句话，史料需要比较！

7) 五一那天我给王晶垚打电话问及 7 人签名字条事，他说那字条不是医院转给他的，是他要求 7 人写的。这里没有因年老记忆不好的问题，因为 10 年，20 年前，30 年前他就是这么说的。于羚应该记得老人的说法。但是，她没有在《谈话》中为老人代言。不同的说法要摆在一起，让读者去比较分辨。她们不是

那样做的。我问是谁的笔迹，他说是刘进的笔迹。但是，李松文承认是自己的笔迹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李松文亲口讲的，是转述。可信度有多大？看来要验笔迹或测谎啦。但，这是公安局的事情。《记忆》无权做。叶维丽口口声声搞调查，为什么不去找王晶焘？她 07 年以前多次去过王家，从来都不问八五的事情。叶之调查是有选择性和方向性的。不利于既定方向的人一律不被选择。王晶焘今年 89 岁。时间不多了。真相将被淹没。

我同意一种提问：现有的文革研究能够著出一部信史吗？

- [陈益南来信（2010-5-9）](#)

《记忆》所刊宋彬彬一事真相，很有意义。的确，有些人对文革历史的认识，其实是按他个人的先入为主概念在探寻，而不是让历史真相说话。不是以史实来显示观念，而是欲以事情来证明其概念。完全弄反了。

历史，的确就在细节之中。像道县大屠杀、知青王百明被杀害这样的悲剧，完全是旧体制（县与公社武装部有关负责人）一手操纵指挥农民中的民兵们所制造的。对此，早已有翔实资料证实。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愿意了解，而只是想当然地以为造反派主宰了文革的一切，便认定是造反派搞的屠杀，将造反派当成一个烂筐，什么坏事都往里面装。

这种状态的存在，完全是被官方三十多年来曲解的文革历史说法给洗了脑，致使凡没有亲历过文革各方面事的人，不自觉便以这官方观点来诠释历史。

我看到一篇网文，对文革中青海军区赵永夫枪杀 818 造反派一事，居然说是“镇压劳改犯暴动”杀得好！还有，最近轰动网上的袁腾飞，在其讲文革历史的视频中，说到这件事时，也是信口开河地说（大意）：“青海那边就闹得很凶，说是造反派，其实都是牢里放出来的劳改犯，跑去要抢军火库，青海军区的赵永夫

少将下令开枪打死了几个人。”袁腾飞是中学高级历史老师，还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过历史。照讲，袁应是一位颇有知识的人，可是，他对文革中影响很大的这桩血案，竟然也是这样颠倒黑白、不负责任！

你我都知道，文革是一个很复杂、曲折的过程，十年间发生了许多事情，错综复杂，黑白相间、是非混行，如果不能实事求是，而全凭某种观念去看，没有不出错的。

这宋彬彬上了天安门，毛泽东也确对她说了“要武”，但，并不能就可由此推断出宋就一定要武了，就一定是杀害老师的凶手。《记忆》刊发的这组文章很有意义，不仅仅是对这件历史公案的澄清，也揭示了一个如何看待历史的道理。历史结论要靠证据支持。不同意叶维丽文章观点的人，有些什么样的根据，可以认定宋彬彬就一定要“要武”、并参与指挥了卞案呢？

以前读到的那些说法，的确已为叶维丽及宋彬彬的文章说法所消解。而不同意叶维丽观点的人，起码应提出新的反证根据（如《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署名宋要武的文章，确凿是宋本人所写；有宋参与或指挥杀害卞校长的直接证据），才能维持他们原来的推论。

如果没有，即便是对宋彬彬，也不能搞冤案啊！

现在很多人，就是在“文革是动乱是浩劫”这个宏论下，想当然地推论文革中的事，而不管那事的细节如何。

有时在讨论中，有的人往往已不是在研究历史了，而容易不自觉地意气用事来维护其观点。人若陷于到这种境地，就很难冷静、客观看待事物了。因此，我建议，暂时回避此事的直接讨论。对宋彬彬问题，只刊发新的论点与证据，让事实说话。

我认为，对文革的研究，有些人的视野，应该还广阔一些，认识到文革中不仅仅发生了迫害性事件，也发生过其他影响文革进程的大事（例如工人农民造反派的活动，下乡知青的抗争，1957年的“右派”借机要翻案等），这样，就不致于坐井观天了。例如，既然文革中曾出现过照片的“换头”那类事件（陶铸指示在报纸中，将陈毅头像换成邓小平），那么，对《光明日报》记者擅自以宋要武署名发表文章一事的发生，便也完全可以理解了。

- [戴为伟来信（2010-5-10）](#)

47期《记忆》5万多字，我看了一天。

读罢这期卞仲耘事件的另类解说，我就像被人不明不白暴打奚落一顿，可到头来却说道不清，一种特别拧巴的感觉。

我曾在《红岩儿女（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看到过卞仲耘校长的故事，它使我泪流满面。在这里说一句多余的话：《红岩儿女》第一部《从潜流到激流》、第二部《从激流到洪流》均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惟独这82万字的第三部《一生都在波涛中》没能正式出版，该书历述了建国后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红岩儿女们的悲惨遭遇。

我曾经觉得卞校长的遭遇是很遥远的故事，可当我那耄耋老父颤巍巍地揽着一束鲜花去看望比他更年迈的王晶垚老伯时，我又奇怪地感觉这故事原来距我并不远。《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这样的悲惨、屈辱、奇耻大辱，也许只有47期《记忆》在世的主角们才会觉得是个“好故事”吧！

由一所中学的历史性的耻辱、悲剧，不禁会使人联想到所有发生过的政治运动和卷入其中的人们：活着的正反两方面当事人都试图通过他们对史实的认知，特别是通过他们的话语权分，左右后人对某段历史的态度，从而证明自己的正确

或者无辜，甚或是摆脱历史对他们的谴责和嘲弄。

如我辈芸芸众生，要想在历史的迷雾中分辨是非，何其难呐！

非常感谢《记忆》的编者，在杂芜的历史中摘取有价值的事件，提供给关心历史的人们去进行有益的思考。这确实是件需要勇气、又非常辛苦的劳作。

● [胡泊来信（2010-5-10）](#)

有必要请贵刊关注一下袁腾飞对于宋彬彬、毛泽东和八一八的认识。网上对此人有专门的介绍：“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精华学校教师，被学生誉为‘史上最牛历史老师’。高中历史新课标教材（人教版）编写者之一；曾参与北京市高考历史命题工作。于2009年7月13日-8月11日应邀登上央视《百家讲坛》节目讲授《两宋风云》。出版图书《历史是个什么玩意》、《两宋风云》、《塞北三朝》。先后被中国教育电视台《教育人生》和中央电视台《小崔说事》应邀，录制访谈节目。

下面是他向听众宣讲的那一段历史——

有个小女孩，给毛主席挂袖章，毛主席有个特点他比较热爱女青年，皇上都这样，毛主席挺高兴，问那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啊，很亲切嘛，领袖，小女孩讲我叫宋彬彬，彬彬有礼的彬彬，领袖一挥手，革命要武斗，不要彬彬有礼，小女孩改名叫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她爸爸是宋任穷上将，所以不可能逮她，但不够岁数嘛，十八岁才能枪毙……文革的那帮人为什么没有罪恶感啊，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停着呢，他还是伟大领袖呢，他让我们这么干的，他没罪我怎么有罪啊，就跟日本人似的，天皇没罪我有什么罪？我打仗为谁打？天皇，天皇没罪我有罪么，我这能叫侵略战争么，道理

是一样的，所以宋要武打死七个人，现在在美国，据说皈依佛门，忏悔，来世变成苍蝇啊跳蚤啊，地狱轮回六道轮回，永远无法摆脱，永世不得超生，她永远在地狱恶鬼畜生这下三途中轮回，不能超生，非常可怕……

以上文字请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5/149867.html>

#### ● [冯建军来信（2010-5-11）](#)

作为一个媒体研究者，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学者，我对《记忆》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我所知道的网刊——《往事》、《往事微痕》、《读书苑》、《交流文稿》、《耀邦研究》、《赵紫阳生平与思想研究》之中，我认为贵刊是最有水平的。因为，它坚持严肃公正的学术立场。在浮躁的语境中，能做到这一点是需要相当强的定力。

但是，贵刊的第47期却让我大跌眼镜——它失掉了以往的沉稳客观，陷入了派性的泥淖之中：

第一，贵刊在卞仲耘案子上，采取了一边倒的立场，完全不顾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王友琴多年来的研究成果。王友琴十几年前就写了多篇相关文章。贵刊至少应该选登一篇，尤其是著名的《卞仲耘之死》。可是，贵刊没有这样做，而是把全部篇幅都给了另外一派——向王友琴鸡蛋里挑骨头的一派。这样做公正吗？更让人不解的是，贵刊发表的叶维丽教授的文章，说王友琴犯了五大错误，（1）忽视了当时的大背景——毛泽东要天下大乱的思路和具体实施。（2）女附中出现了权力真空，红卫兵还没成立。（3）王友琴是高一三班的，这个班打人最凶，王应该知道谁是策划谁是真凶，但王不说，却把矛头指向宋彬彬。（4）王友琴对至关重要的证据——七人名单的左右顺序弄反了。（5）王友琴编造了“宋要武的故事”。而冯敬兰主持的“也谈”之中，更是强化这些对王友琴的指控。请问，贵刊的

这种不允许王友琴说一句话的作法，客观公正吗，符合学术道德吗？

第二，更不公正，更不道德的是，贵刊的屁股坐在了宋彬彬的板凳上，并且不很高明地替宋彬彬鸣冤叫屈。(1) 宋彬彬明明用过“宋要武”的御赐名字，可在冯敬兰的访谈中，宋却矢口否认。在卡玛的片子里她就一推六二五。在这里把责任全推给报社的记者。她说那是光明报和湖北报上发表的文章是记者干的，而证据却付之阙如。(2) 宋彬彬说她父亲也被打倒，母亲也被关了，她无路可去只好投奔同学去插队。可她为什么不说说，她是怎么上的大学，怎么去的美国？请问，当年没有后门的能上大学吗？同样，叶维丽如今能当上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不也是沾了太子党的光，走了后门吗？(3) 宋彬彬没有当官，但是这并不证明她没有沾太子党的光，太子党的好处用不着赤裸裸地体现在其本人身上。

第三、贵刊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真凶的作用。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早就说过：“由于卞仲耘和大批教育工作者的死亡不被记载和报告，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红卫兵们也从来没有认真道歉忏悔过。比如刘婷婷参与过 1966 年 8 月 5 日殴打卞仲耘致死的暴力行动，她的国家主席女儿的身份，显然对暴力行为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冯敬兰的访谈不敢正视王友琴早就提出的刘婷婷的问题，在这一关键点上轻轻地滑过。这不是为刘少奇讳又是什么？难道刘少奇的惨死就能掩盖他反右、大跃进时的错误和罪过？难道父亲冤死可以免除女儿的罪责吗？

《独立评论》网站寒江月的网友的话令人警醒：“到底是谁参与了打卞校长？列个名单出来不就行了？绕了一大堆圈子，团团转就是转不到这个点子上。给人的印象是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为彼此开脱。从历史研究角度来说，那天动手打人的，跟她们后来的遭遇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她们后来的遭遇，就回避她们当时的角色。”

以上诸点，请贵刊三思。

[编者回复冯建军：](#)

感谢您的说论直言。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刊在编发 47 期时，最先考虑的就是将王友琴的《卞仲耘之死》编为头条。我们为此征求过她的意见。详见我们给郭建的回复。

关于来信中的指责——我们只给叶维丽、冯敬兰等说话的机会，不给王友琴说话的机会，有违公正原则和学术道德云云。我们的解释如下：造成一边倒局面的原因，除了因我刊未得王友琴授权，无法编发她的相关文章外，还有一个刊发新观点的考虑——王友琴的有关文章，如《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卞仲耘之死》、《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师——卞仲耘》等文及其增补版，多年来在网上、刊上、书上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记忆》刊登少为人知或不为人知的不同观点和新的说法，会引起学界的关注，促进研究的活跃与深入。这里面绝没有不让谁说话的意思。如有朋友不同意叶维丽、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刘沂伦的观点，完全可以在以后就要问世的“女附中文革专辑（二）”中畅所欲言。如果王友琴愿意回应叶维丽提出的五点分歧，并授权我刊发表，《记忆》将不胜荣幸。

关于来信中提到的宋彬彬、叶维丽走后门上大学，到美国留学，以及是否沾了太子党的光等问题，我们将把大札转给她们，如其作复，我们将同样全文照登在下一期的“编读往来”之中。

至于大札对《记忆》保护真凶的指控，本刊愧不敢当。一者我们没有这种愿望，二者我们也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所有的只是“三不主义”：不党不私，不偏不倚，不分内外畛域。只求推进文革研究，成为大家的平台。文革历史错综复杂，

时间又过去了四十多年，因记忆、观点及立场不同而产生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享有平等的说话机会，是《记忆》的希望和努力方向。

- [\(美\)任国庆来信\(2010-5-13\)](#)

关于卞仲耘受迫害致死，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层次的问题值得思考：

1，政府犯罪。文革是国家最高首脑直接利用行政命令强力推行暴力的，因此，在运动中暴力行为所产生的一切后果，首要责任人应该是文革的发动者。

2，释放了人性中固有的虐待欲。人性中的虐待欲是处在社会的法律和人心中的道德律管制之下的。只要把虐待冠以正义、崇高的名义，虐待行为一定会发生。一旦这样的暴力事件发生，自然会进入一个“残忍→崇高→更加残忍→更加崇高……”的恶性循环中去。中国的文化革命，再早些时候的“打土豪，分田地”，以及二战中日军屠杀中国百姓，纳粹杀人工厂虐杀犹太人等等事件，没有一个例外。

3，中国人不忏悔。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忏悔机制，这跟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化成为鲜明的对照。至今迫害卞仲耘的人没有一个承认错误的。反过来说，假如她们忏悔了，也决不会有好下场——愤怒的唾沫会把她们淹死。殊不知愤怒的人们，无非也是使用暴力（语言暴力）获得崇高感的一种做法，与施暴者别无二致。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认可她们良知的发现和认错勇气，这无疑是对忏悔者的支持，但这种力量太微弱。这大概也是文革中那些暴力实施者们不忏悔的原因。忏悔是实现“自我救赎”最有效的方法。